

師承與轉益：以孫應時《燭湖集》 中的陸門學友為中心

黃寬重*

本文以孫應時《燭湖集》中的陸門學友為中心，討論與他共同師事陸九淵的十六位學友，師從學道的狀況，瞭解早期陸學門人學習變化與人際互動的重要基礎。藉由陸門弟子與陸九淵以外的道學大儒之互動，有助釐清幾個概念性的問題：第一，道學發展的過程中，門戶藩籬是逐漸形成的。南宋道學發展之初，師生與從學的觀念相當開放，陸學門人師從陸九淵前，多有從學其他大儒者，時人甚至以兼學多師為榮。第二，陸學弟子有由兼學多師朝向轉益他師發展的現象，成為陸學一大考驗。陸學先後受到以呂祖謙為首的功利學派與朱學的挑戰，除少數在四明講學的門人仍堅守陸學主調外，包含孫應時在內的諸多陸門中人，皆與朱熹在政務與學術上有頻繁的互動，從而產生學習轉向的現象。門人的轉益與學派競合聯結，使道學門戶越益森嚴。陸學早期門人，多出身太學。太學是一個多元且開放的學習場所，師生容易在學習過程中形成社群與追尋典範。太學生多期望能夠兼顧仕進與學術，在太學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大儒，師從多位名師是普遍現象。陸學門人不乏基於現實考量，轉向擁有學政優勢的呂祖謙與朱熹問學。因此，從陸門早期弟子中，偏高的太學生屬性來看，有助瞭解陸門子弟轉益他師，不守一說的原因，以及南宋中期，諸派競合的發展過程。而由陸學早期弟子轉益多師的現象，可見士人面對外在環境的轉變，有不同的應對態度與方案，學術典範的選擇與政治現實的抉擇，因人而異，不能簡單看待。

關鍵詞：孫應時 陸九淵 呂祖謙 朱熹 太學

*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一・前言

從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至寧宗開禧三年（1207）約三十年間，是南宋士人在學術與政治兩方面，活動頻繁而且相互關聯的時期。學術方面，這是呂祖謙（1137-1181）、張栻（1133-1180）、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2）等道學大儒，在理念上從相融到各立門派的競合；政治方面則藉由參與朝政改革，相互扶持，與近習及官僚集團展開競爭，形成既有學術交鋒，又有政治協力的現象。無論就南宋歷史，乃至中國歷史，都是極富討論意義的時期。¹

不過到目前為止，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仍偏重於少數著名朝臣與大儒。相對地，對眾多追隨者及一般官僚，從理念、態度到參與政治的實況及其遭遇，因史料不足或分散，研究成果相形薄弱，對全面瞭解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顯有不足。為彌補此一遺憾，本人曾撰寫〈學宦難兼：孫應時曲折多艱的生命歷程〉一文，針對朱、陸的追隨者孫應時（1154-1206）在仕途與學術發展及其遭遇，進行個案研究，希望有助瞭解南宋第二代道學者的生命歷程。²

太學是孫應時邁向功名的重要起點，也是開啟他追隨典範、學習道學的場域。孫應時與太學同學師從甫獲進士、闡揚心學的道學新銳象山先生陸九淵，成為陸學的早期門人；後來也從學於東萊先生呂祖謙，最後則轉師晦庵先生朱熹。這種轉益多師的態度，遭到象山的不滿與批判。值得探究的是，孫應時的轉益多師，在陸門是不是個案？如果不是個案，那麼是什麼因素造成士人從學多師？與當時道學發展與學派競合有何關係？基於此一疑惑，使本人在研究孫應時之後，想進一步瞭解與他有相同背景、共同追求學術的同道們，在師承上為何有所轉變？遂擬以孫應時《燭湖集》中的陸門學友為中心，討論與他共同師事陸九淵的學友，師從學道的狀況，希望能從大儒外的角度，認識當時的師徒關係及學術競

¹ 學界在這方面的討論成果極為豐富。具代表性的論著是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一書。

² 黃寬重，〈學宦皆空：孫應時坎坷困窘的生命側寫〉，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12年6月20-22日），頁1-30；後修改為〈學宦難兼：孫應時曲折多艱的生命歷程〉，柳立言主編，《近世中國之變與不變》（收入《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1-52。

合，³ 較全面地瞭解南宋中期士人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互動、師承的轉變和對個人的影響。

從乾道八年（1172）到淳熙二年（1175），三年的太學生涯，對孫應時而言，不僅致力舉業，也與一批理念相同的學友，共同追隨象山兄弟，豐富了生命的意義。乾道八年，三十四歲的理學大儒陸九淵，雖剛中進士，但聲名已滿臨安，追隨者眾多。孫應時和眾多士人，因欽仰陸九淵的學識，而成為陸象山的首批弟子，共同走向探研性理的學術之路。象山兄陸九齡（1132-1180）在給學者的書信中，提到的從學門人，即包括孫應時：「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宗）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亹亹篤學，尊信吾道。」⁴ 據趙偉《陸九淵門人》一書所列陸門弟子共有一百八十六名，其中與孫應時認識且見於其著作《燭湖集》的人，包括：諸葛千能、諸葛壽之、石斗文（1128-1189）、石宗昭、胡拱、胡撙（1147-1195）、項安世（1153-1208）、王遇（1142-1211）、陳剛、潘友文、高宗商、劉堯夫（1147-1190）、楊簡（1141-1226）、袁燮（1144-1224）、沈煥（1139-1191）、沈炳等十六人，⁵ 都是陸九淵的早期門人，也是本文分析討論的對象。

本文藉由《燭湖集》，探討孫應時的陸門學友，師承及轉益的基礎。現存四庫本《燭湖集》係輯錄自《永樂大典》，並非完帙，留存的孫應時學友可能有所遺漏，即使《燭湖集》所提及的學友，大部分的生平資料也十分簡略，難以呈現完整歷史面貌。不過，這些人僅是研究的對象，尚需要蒐集整理零散片斷史料，重建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才能對這些人的學習過程、師從動向，有較多的瞭

³ 學界對南宋道學發展，長期以大儒為論述中心，較具代表性的專著包括：陳來，《朱熹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增定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89）；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何俊，《南宋儒學建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及其他關於宋明理學的著作，均侷限以朱陸為中心。陳榮捷的《朱子門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徐紀芳的《陸象山弟子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及趙偉，《陸九淵門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則大量分析朱陸門人，但仍以朱陸二人為中心，並非以其門人弟子為重點。

⁴ 陸九淵，《陸九淵集》（臺北：里仁書局點校本，1981），卷三六，〈年譜〉，頁 487-488。

⁵ 見徐紀芳，《陸象山弟子研究》，頁 33-96。其中高商老與高宗商，歷來多將之列為二人，除徐紀芳外，趙偉在《陸九淵門人》一書亦分述（頁 186-188），但本文考證應為一人，見下文。

解。本文為詳人所略，生平仕歷資料豐富又有文集，研究成果也較多的袁燮與楊簡，則僅作簡要敘述；而將重點置於非顯官名儒、資料零散的陸門早期弟子。但這些人物的學宦歷程，散見於文集的書信與墓誌中，蒐集整理不易；資料的繁年尤為困難，卻是瞭解其學習變化與人際互動的重要基礎，是本文著力的重點所在。因此，文中有較長的篇幅是透過資料的梳理，以建立其生平仕歷與學習歷程。最後，歸納出若干觀察心得作為結論，期對既有的研究成果，提供補充的觀點，有助於學界進一步思考擴展南宋中期政治文化史研究的視野。

二・傳揚陸學的弟子：沈煥與胡拱兄弟

從學習過程來看，孫應時的學友，大致上有二種不同的發展傾向。首先是發揚陸學的重要門人，包括沈煥、楊簡、袁燮與舒璘（1136-1199），即所謂具地域特色的「甬上四先生」。這四人中，除舒璘外，均曾於淳熙十、十一年（1184）間，被史浩（1106-1194）邀請回到四明，致力於發揚道學與塑造社會文化；由於他們透過講學，積極闡揚陸學的核心價值，使四明一時成為陸學的中心。此時，孫應時也與沈煥之弟沈炳，被史浩延請到四明擔任其子弟的老師。由於互動頻繁，使孫應時與沈、楊、袁三位的關係較他人密切。

沈煥是陸門中與孫應時最密切的人。他們認識最早（乾道五、六年），在明州期間情同莫逆。⁶ 沈煥拜見過孫應時的父親孫介，甚至寫孫介的行狀，作為孫應時邀請朱熹寫墓誌銘的基本資料。⁷ 紹熙二年（1191）沈煥死，孫應時有弔挽詩，述二人情誼，說「請益從公久。忘年愛我深……回首南湖侶，傷懷流水音，九原那可作，千里坐悲吟」；⁸ 並親赴墓地長祭，表明「百年知己淚，洒盡欲何言」，⁹ 可見二人交情篤厚。在開禧二年（1206），現實環境仍不利於黨人及其門徒的情況下，孫應時以五十三歲逝世，他的兒子祖開只有九歲，老母年邁，景象淒涼，楊簡為他撰寫墓誌，闡述他們共同追隨陸九淵的歷程，以印證孫應時是象

⁶ 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孫應時，《燭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1166冊），附編，卷下，頁5下。筆者在傅斯年圖書館與哈佛燕京圖書館，尋得清嘉慶靜遠軒藏版的內容，可以增補、修訂四庫本內容，唯檢視本文所引《燭湖集》內容，靜遠軒本與四庫本無異。

⁷ 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5上-下。

⁸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七，〈挽沈叔晦國錄〉，頁15上-下。

⁹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七，〈哭沈叔晦墓〉，頁5下。

山門人。¹⁰《燭湖集》中雖未見袁燮與孫應時共同活動的文字，但應時有二首送袁燮的詩，記載二人的關係。¹¹ 由於在孫應時的《燭湖集》、袁燮的《絜齋集》、楊簡的《慈湖集》與沈煥的《定川集》中，均未留下孫應時與這三人直接通信或論學的資料，顯示資料遺佚嚴重，致未能為這一段共學情誼與論學之風留下可稽的紀錄。舒璘則未見與孫應時往來紀錄。

甬上四先生是發揚象山心學的功臣，但他們的師從關係卻相當複雜。元人戴表元（1244-1310）說「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袁燮、袁甫）、若文元楊公敬仲（簡）、文靖舒公元質（璘）、端獻沈公晦叔（煥），其尤著者也。」¹² 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也評價象山在浙江的門人說「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¹³ 他們雖以持守及闡揚象山心學為志，但學習師從卻是多元的。楊簡，固受陸九淵影響最深，也是象山最得意的學生，然得自其父楊庭顯的家學也多，亦與朱熹有所交往，並非專從象山。¹⁴ 袁燮固然主要師從陸九淵，但他除家學外，也分別從游於呂祖謙與陳傅良（1137-1203），真德秀（1178-1235）為他寫〈行狀〉中說：「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¹⁵ 舒璘是象山同年進士，更是從游多人，從學多師，《宋史》本傳稱「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游……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之」。¹⁶ 全祖望稱「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公持之（童大定），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張栻），因遍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

¹⁰ 楊簡，〈孫燭湖墳誌〉，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11下-12下。

¹¹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八，頁17上-下，19下。

¹² 戴表元，《剡源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4冊），卷一八，〈題新刻《袁氏孝經說》後〉，頁2下。

¹³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503；趙偉，《陸九淵門人》，頁24。

¹⁴ 參見孫齊魯，〈陸象山與楊慈湖師弟關係辯證〉，《現代哲學》2010.2：116-122；鍾彩鈞，〈楊慈湖心學概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7（2000）：289-338；董金裕，〈楊簡的心學及其評價〉，《國立政治大學學報》61（1990）：31-43。

¹⁵ 真德秀，《西山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卷四七，〈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頁25下；趙偉，《陸九淵門人》，頁172-176。

¹⁶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四一〇，〈舒璘傳〉，頁12339。

淵源為最博，其行亦最尊」。¹⁷

沈煥師從九齡之外，亦與呂、朱等大儒多所交游。沈煥，字叔晦，父親沈銖嘗師事焦瑗（公路），傳程氏之學。沈煥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鄉舉第二，乾道初入太學與同里袁燮、楊簡、舒璘同學，以道義相切磨，師事太學錄陸九齡（文達），與群賢定交。乾道五年（1169）中進士，授上虞尉。淳熙四年（1177）游武義明招山，與呂祖謙、祖儉（?-1196）兄弟辯論古今；十年應史浩之邀，講學於竹洲，與在城南之袁燮、碧沚之楊簡及任明州倉監之呂祖儉往來頻繁，亦與任史浩子弟教席之孫應時往返密切。時朱熹在浙東救災，與叔晦多有論學；十三年（1186）任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負責上虞、餘姚兩縣賑救，頗有勞績；十五年，葉適薦陳傅良三十四人中，即包括叔晦。¹⁸十五年改知徽州婺源縣，三省交薦，通判舒州，未赴。紹熙元年（1190）與史浩、汪大猷（1120-1200）等於明州創鄉曲義莊，次年四月卒於家，享年五十三歲。¹⁹

沈煥自幼得諸家學，在太學師從九齡。陸氏兄弟致力心學，四明諸子多從之學，「五六年間，朋從日盛，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為不朽計。」²⁰ 沈煥有詩箴學友曰：「為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²¹ 其學術顯然是陸學的主調，故後世將之列為象山門人。沈煥與樓鑰（1137-1213）、楊簡等亦為薛季宣（1134-1173）論學之友。乾道九年（1173）季宣死，煥有書致祭，說「道學未立於至聖之域，朋友未得其傳授之全，公志願未竟而終。天乎命也夫，何為使朋友至此極也」。²²《浪語集》有〈抵沈叔晦〉一文，殆作於季宣逝世前，為二人論辯知行之文，季宣主行，故說「且誠之者，人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於天之道哉。今之異端道言，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昧於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既知之

¹⁷ 全祖望，《鮚埼亭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292-295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姚江借樹山房刊本重印），外編，卷二四，〈廣平先生類稿序〉，頁5上；趙偉，《陸九淵門人》，頁219-221；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56。

¹⁸ 葉適，《葉適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前集，卷二七，〈上執政薦士書〉，頁555-556。

¹⁹ 沈煥生平事蹟錄自張壽鏞編，吳洪澤校點，《定川言行彙考》（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第10冊），頁6460-6485。

²⁰ 袁燮，《絜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5冊），卷一四，〈通判沈公行狀〉，頁19上。

²¹ 袁燮，《絜齋集》卷一四，〈通判沈公行狀〉，頁25下。

²² 薛季宣著，薛旦編，《浪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9冊），卷三五，〈附錄·祭文·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沈煥〉，頁10下。

矣，可與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²³ 其後又與呂祖謙、祖儉兄弟交，與子約關係尤密，袁燮即說「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廣深。君子以是知君胸中之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²⁴ 與功利學派之交流，使他的為學態度已由約而博，由知而行，不全然是陸學門徑，因此全祖望說：「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²⁵

沈煥與朱熹也多有互動。除淳熙八年（1181）朱熹向沈煥抱怨麻沙出版呂祖謙《大事紀》等書，真偽相半之外，在論學上頗多交鋒，先是說：「沈叔晦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淺狹，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亦不博之弊。」²⁶ 而在淳熙十二年的三封信，朱熹對沈煥有諸多批評，如說：「前日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²⁷ 又說：「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²⁸ 已是將沈煥視為亦陸亦呂的中間型學者。²⁹ 雖然在學術上彼此交鋒甚銳，但朱熹對甬上四君子的學行頗為肯定，如其學生滕德粹要到明州任官時，朱熹不僅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從游者」。³⁰ 紹熙元年（1190），朱熹在漳州推動經界法頗受挫折，可能鑑於沈煥等人在四明推動鄉曲義莊積極有成，也曾致書叔晦，說明推行經界的艱難並請教。³¹

沈煥弟沈炳，字季文，生平事蹟不詳。只知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陸象山，

²³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五，〈書·抵沈叔晦（煥）〉，頁8上。

²⁴ 袁燮，《絜齋集》卷一四，〈通判沈公行狀〉，頁25下-26上。

²⁵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一六，〈竹州三先生書院記〉，頁6下。

²⁶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二六，〈訓門人〉，頁2882。

²⁷ 朱熹著，陳俊民校刊，《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正集，卷五三，〈答沈叔晦二〉，頁2537。

²⁸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三，〈答沈叔晦三〉，頁2536。

²⁹ 見東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頁585。

³⁰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六，〈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頁2上；又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一八，〈訓門人〉，頁2835。

³¹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三，〈答沈叔晦四〉，頁2537-2538。

務窮性理。後趙汝愚 (1140-1196) 以遺逸薦舉，不就。朱熹說他「於小學，則有莊敬敦篤，而不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於大學，則不由格物、致知，而遽欲誠意、正心」，³² 顯然是陸學一派。沈炳與孫應時曾於淳熙十一、十二年 (1185) 間，在東湖書院任史浩子弟的教師，交往甚密，相知較深。大約於十一年九月重陽，孫應時敘與沈煥兄弟及王仲舉登鄞縣城的詩說：「一笑四人真莫逆，百年此會定難忘」。³³ 紹熙二年 (1191) 三月應時任遂安令，給象山的信中，感傷浙中朋友凋落或散在各地，說「獨賴季文沈兄相鞭策，有興仆植僵之力，但講評義指多不相合」。³⁴ 次年又向象山說：「沈季文去歲親炙幾日，此兄實剛特可喜。」³⁵ 同年，請潘友恭指正他的學行時，也盛讚沈炳坦然不媚俗的個性，說「沈季文兄要是強毅，截然不繳繞媚世，真古學者氣象」。³⁶ 顯示二人的學術旨向未必相合，但交情甚篤。

除沈煥兄弟外，會稽人胡拱、胡撙兄弟也服膺象山學說。胡氏兄弟的父親胡沂 (1107-1174) 是孝宗朝名臣，祖父胡宗伋 (1071-1140)，字浚明，是孫應時父親孫介的業師。³⁷ 胡沂是光宗為皇子時的老師，光宗時諡號獻肅。³⁸ 拱字達材，是胡沂長子，紹興三十二年 (1162) 中鄉舉，因父蔭任監臨安府回易庫，淳熙八年史浩向孝宗推薦「懷才抱識，沈伏下僚而未能自達」的十五位臣僚中，指胡拱「沈厚似沂，而拱行尤峻，安恬守道，不願人知」。³⁹ 同知樞密院事葛邲也曾論薦，但未及任用，次年死，⁴⁰ 無子，以弟撙之次子衍為嗣。⁴¹ 孫應時在祭文中指「國有老臣，能以兄薦，以退蒙進，漠焉非願」。⁴²

³²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八，〈雜類〉，頁 3292。

³³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八，〈九日與沈叔晦季文王仲舉登鄞城〉，頁 6 下。

³⁴ 孫應時，《燭湖集》卷六，〈上象山陸先生書〉，頁 10 上。

³⁵ 孫應時，《燭湖集》卷六，〈上象山陸先生書〉，頁 12 上。

³⁶ 孫應時，《燭湖集》卷六，〈答潘宣幹書〉，頁 22 下。

³⁷ 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頁 1 下。

³⁸ 脫脫等，《宋史》卷二五五，〈胡沂傳〉，頁 11909-11910。

³⁹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1 冊），卷九，〈陞辭薦薛叔似等劄子〉，頁 1 下-2 上。

⁴⁰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代請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胡沂謚狀〉，頁 10 上。

⁴¹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二，〈胡提幹墳記〉，頁 20 下，作「淳熙壬寅終，更以兄達材之喪，乞監西京中嶽廟」，無子，以弟胡撙之次子衍為嗣。葉適，《葉適集》卷一七，〈胡崇禮墓誌銘〉，頁 338。

⁴²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三，〈祭胡達材文〉，頁 9 上-10 上。

胡搏，字崇禮，是胡沂的四子，紹興十七年（1147）生，乾道九年（1173）恩補承務郎，監臨安樓店務。拱死，乞監西京中嶽廟，歷轉承奉、承事、宣義郎；淳熙十五年（1188）任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紹熙三年（1192）充浙西提舉茶鹽幹辦公事，寧宗繼位，恩轉奉議郎。五年，浙西水旱相連，湖、常兩州被禍尤重，崇禮請於朝，運米賑災，勞苦過度，於慶元元年（1195）五月，以疾卒於蘇州官舍，享年四十九歲。長子胡衡，官至明州通判；次子胡衍為孫應時女婿，官至知溧陽縣。⁴³ 胡拱與胡搏共護家門，兄弟情重，葉適說：「崇禮步趨顧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為法，夢想跂及，無念不以家門為重，……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不得是，無以喪吾兄』恤助族人，墮枝脫葉，亦使自存」。⁴⁴ 都是崇禮營護所致。孫應時有長文祭崇禮，稱讚他對親人「莫不致愛於其生存，而致隆於其喪紀，莫不盡力於其墓宇，而盡誠於其時祀，莫不務實於其手澤，而務揚於其德美」。更推而及於宗族、鄉里，誠為「善人且有恆者」。⁴⁵

胡氏兄弟均是象山早期門生。陸九齡記乾道八年象山中舉後入浙，多位從游的學生中即有胡拱。⁴⁶ 象山曾有二書給達材，稱他資質甚美，且嗜學之誠，但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乃害心之大者，「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⁴⁷ 並囑他對《孟子·告子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⁴⁸ 胡氏為會稽望族，兄弟既信服象山之說，乃提供其家作為象山入浙後講學聚徒之地，對陸學在浙東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葉適在胡搏的墓誌銘說：「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為其學尤眾。兩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周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飯羹，歷歲閏閏，無改其度，士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⁴⁹ 雖然黃震說這是葉適出於譏諷的文字，⁵⁰ 但從袁燮〈祭胡達材文〉中，見胡拱追求學術

⁴³ 參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二，〈胡提幹墳記〉，頁20上-21下；葉適，《葉適集》卷一七，〈胡崇禮墓誌銘〉，頁338。

⁴⁴ 葉適，《葉適集》卷一七，〈胡崇禮墓誌銘〉，頁337。

⁴⁵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三，〈祭胡崇禮提幹文〉，頁10上-12上。

⁴⁶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88。

⁴⁷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四，〈與胡達材〉，頁56。

⁴⁸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四，〈與胡達材〉，頁57。

⁴⁹ 葉適，《葉適集》卷一七，〈胡崇禮墓誌銘〉，頁338。

⁵⁰ 黃震，《黃氏日抄》（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據日本立命館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二年新安汪佩鏐重校刊影印），卷六八，〈讀文集·葉水心文集〉，頁11下。

的熱忱，及對象山學說的信從與恭行實踐之情，說：「維兄求師友於四方，探聖賢之淵源，不違世以立異，不同流而詭隨，恬澹自守，不求聞知，此善類所資以磨琢，而吾道所賴以扶持，調降年其有永，何一往而莫追……」。⁵¹ 可惜胡氏二兄弟均英年早逝，除提供象山講學場地，以行動支持陸學在浙東的發展外，道學內涵的傳承情況不明。

從孫應時的書信中，則可以看到胡撙與朱熹往來互動的資料。淳熙十六年(1189)，孫應時曾請朱熹為其父寫墓誌，他與自台州返鄉的胡撙共讀朱熹的回信，頗為感動；胡撙也請求朱熹為先人寫墓誌，而說「兩家儻遂皆拜大賜，泉壤交榮，諸孤死無恨矣，哀懇哀懇」，並由胡撙遣人送信。⁵² 到紹熙二年十二月以後，孫應時給朱熹的信中仍表示孫、胡兩家均希望得到墓誌，說「某先人墓碣，幸蒙開諭，調不渝前言，恨不得負笈歛門，日日伏請，亦惟亟垂大惠。崇禮每書來，尤祝同申此意也」，⁵³ 然而並未獲朱熹撰文。從有限的資料顯示，朱熹與胡撙雖有所互動，但不涉及道學理念的討論。

胡氏兄弟與孫應時的關係甚為密切。除了是同鄉外，孫應時的父執輩受教於胡宗伋（浚明），應時與胡氏兄弟共學於陸象山門下，交情甚篤。應時為胡拱、胡撙寫祭文，有詩挽達材，為胡撙寫壙記，教其子胡衛、胡衍，將女兒嫁給胡衍為妻。他為次女與胡衍締婚書中稱「四世百年相為師友，兩家今日遂託舅甥」。⁵⁴ 在〈與胡晉遠（衍）書〉中，充分表現出長者的關懷與期待，⁵⁵ 晉遠赴外任官時，應時有二詩相贈。⁵⁶

三・轉益多師的陸門弟子

上述象山門人，雖亦從游於呂祖謙、朱熹等當代名儒，但仍持守陸學，闡揚心學。相形之下，與孫應時同樣追從多位道學名家甚至轉益的學友，則所在多

⁵¹ 袁燮，《絜齋集》卷二二，〈祭胡達材文〉，頁12上-下。

⁵² 孫應時，《燭湖集》卷五，頁2下-3上。

⁵³ 孫應時，《燭湖集》卷五，頁6上-下。

⁵⁴ 孫應時，《燭湖集》卷八，頁26上。

⁵⁵ 孫應時，《燭湖集》卷六，頁12下。

⁵⁶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六，〈送胡婿晉遠赴嘉興酒官〉，頁17上，及同卷，〈送胡婿晉遠赴義烏丞〉，頁13下。

見。⁵⁷ 以《燭湖集》所見，孫應時之外，尚有劉堯夫、陳剛、石斗文、石宗昭、高宗商、諸葛千能兄弟和項安世、潘友文、王遇等十人。茲以屬性相近者分別說明。

（一）劉堯夫與陳剛

劉堯夫，字淳叟，與陸九淵兄弟同鄉，十七歲即師事陸九臯（即庸齋，1125-1191），繼師九齡，最後師象山。乾道八年入太學，⁵⁸ 淳熙六年（1179）中進士。⁵⁹ 劉堯夫是太學上舍兩優釋褐者之一，所享的榮耀與科舉狀元等同。因此周必大（1126-1204）在嘉泰二年（1202）撰〈撫州登科題序〉中即指出「近乙未（淳熙二年）歲，羅點廷試為榜眼，劉堯夫釋褐冠上舍，（王）克勤由童子舉入館閣，是又盛事參集者」，⁶⁰ 可見堯夫被鄉里視為舉業的指標性人物。他如何自太學兩優釋褐的故事，《夷堅志》有生動的描述。⁶¹

堯夫在太學期間，曾從太學博士呂祖謙游。祖謙於淳熙五年四月給朱熹的信中，對劉堯夫頗為推重，說「劉淳叟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求教，敢望不倦海誘。蓋往歲某為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志而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⁶² 淳熙八年八月，祖謙病逝，劉堯夫與樓鑰、薛叔似（象先）、趙焯（景昭，?-1183）、徐誼（子宜，1144-1208）等致祭，即說「鑰等登公之門，常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者，何敢知公之所至」，⁶³ 揭示登門問學情狀。

堯夫中舉後，即於淳熙七年（1180）任國子正，繼遷太學博士，陸對，極論

⁵⁷ 趙偉，《陸九淵門人》所列象山門人，兼從他師者達四十八人。

⁵⁸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217。「劉堯夫」條作「乾道己丑（1169）入太學」。

⁵⁹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收入《宋史資料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第一輯），甲集，卷一三，〈釋褐狀元恩例〉，頁22上；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二七，〈復陸伯壽〉，頁326。

⁶⁰ 周必大著，周綸編，《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2-1103冊），卷五四，頁19上。

⁶¹ 洪邁著，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006），乙志，「劉堯夫」條，頁872；林岩，〈南宋學校取士諸問題考論〉（待刊稿），頁19-23。

⁶² 呂祖謙著，呂祖儉、呂喬年編，《東萊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0冊），別集，卷八，〈與朱侍講元晦〉，頁12下。繫年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602；杜海軍，《呂祖謙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219。

⁶³ 呂祖謙，《東萊集·附錄》卷二，〈祭文〉，頁12上。

時相之失，為朝論所讚賞。淳熙十二年五月，楊萬里（1127-1206）向王淮（1126-1189）薦朱熹等六十人，稱堯夫「嘗冠釋褐，立朝敢言」，⁶⁴ 陸九淵亦讚其敢言。朝廷或有意任之為監司。⁶⁵ 但由於個性剛正，批評時政過猛，引起朝政漣漪。後改任隆興府通判，樓鑰有詩送之。⁶⁶ 喻良能在作詩送他赴任時，稱「劉侯精神秋隼緊，高論懸河傾不盡，至尊動色嗟諤諤，權倖切齒畏謇謇」。⁶⁷ 淳熙十三年，時任勅令所刪定官的陸九淵，在給朱熹的信中，曾隱晦說到：「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傳會之辭。」⁶⁸ 此或與堯夫在任上生事有關，《朱子語類》即載「因論劉淳叟事，云：『添差倅亦可以為』。論治三吏事，云『漕自來為之亦好，不然，委別了事人。淳叟自為太掀揭，故生事』」。⁶⁹

紹熙二年劉堯夫暴卒，得年僅四十四歲。⁷⁰ 陸九淵在紹熙二年，致林叔虎書中說「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己為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⁷¹ 象山在給陳傅良的信中，對堯夫死前的情況有清楚的說明：「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闔，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⁷² 元人

⁶⁴ 楊萬里，《誠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195-199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江陰繆氏藝風堂藏宋寫本重印），卷一一三，〈淳熙薦士錄〉，頁 1 下；脫脫等，《宋史》卷四三三，〈楊萬里〉，頁 12868。

⁶⁵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七，〈與包顯道書〉，頁 100。繫年依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 818。

⁶⁶ 樓鑰著，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七，〈送劉淳叟博士倅豫章〉，頁 164。

⁶⁷ 喻良能，《香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1 冊），卷三，〈古風一首奉送淳叟太博通守豫章〉，頁 13 上。

⁶⁸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七，〈與朱元晦〉，頁 94。

⁶⁹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〇，〈訓門人〉，頁 2912。

⁷⁰ 吳澄著，吳當編，《吳文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卷二二，〈金谿劉太博文集序〉，頁 8 上-下。

⁷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九，〈與林叔虎〉，頁 126。文中說去冬為陳貴溪作重修學記，去冬依〈年譜〉為紹熙元年。見《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三月三日），頁 508。其後，孫應時給象山書中提到「每念誠之、淳叟皆為古人。誠之可惜，淳叟可恨也。」見氏著，《燭湖集》卷六，〈上象山先生書〉，頁 10 上-下。

⁷²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九，〈與陳君舉〉，頁 128。

吳澄也惜其英年早逝「惜其達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⁷³

劉堯夫除了追隨象山兄弟、呂祖謙外，亦向朱熹問學。朱熹在淳熙六年十月，答呂祖謙信中，即提到曹建（立之，1147-1183）與劉堯夫。⁷⁴ 先是堯夫在呂祖謙引薦下，於五年到崇安訪朱熹。⁷⁵ 七月，⁷⁶ 朱熹偕蔡元定（季通，1135-1198）、江默（德功）、廖德明（子晦）、方士劉子翔等人，與堯夫共遊武夷天湖、雲谷等地，並賦詩與論學。⁷⁷ 堯夫在武夷與朱氏師徒唱酬融洽，朱熹即向呂祖謙說「數日講論甚適」，⁷⁸ 堯夫此行為朱熹與陸九齡會晤奠下良好基礎。次年三月，堯夫陪九齡會見朱熹於鉛山觀音寺，除有詩唱和外，亦多問學之舉。⁷⁹ 七年三月劉堯夫出任國子正，在赴臨安前，到南康見朱熹，二人曾就朱子的《太極圖說解》講義，展開辯論，同時也替朱熹帶信給宰相趙雄，⁸⁰ 說明堯夫與朱熹互動頻繁，朱熹弟子在編纂《朱子語類》時，仍視堯夫為朱子門人。⁸¹ 但朱、劉二人的學術觀點卻不一致。且從陸九臯祭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尤足為貴」的深切言詞，⁸² 及陸九淵給陳傅良信中，透露對堯夫的哀念之詞，還有堯夫與朱熹對《太極圖說》論辯的內容，顯示儘管劉堯夫與朱熹頗有互動，但陸、劉二人師徒的情誼仍甚深。

⁷³ 吳澄，《吳文正集》卷二二，〈金谿劉太傅文集序〉，頁8上-下。

⁷⁴ 朱熹，《朱子文集》卷三四，書十一，〈答呂伯恭·二十八〉，頁1359。繫年依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168。

⁷⁵ 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593。

⁷⁶ 東景南作五年七月。繫年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602；又見《朱子大傳》，頁426。

⁷⁷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六，頁240。朱熹曾就堯夫請教靜坐說，有所評述，並提出「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〇，〈訓門人〉，頁2911；又見東景南，《朱子大傳》，頁429, 460。

⁷⁸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三四，〈答呂伯恭·八〉，頁1339-1340。

⁷⁹ 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602, 604, 617, 619；又東景南，《朱子大傳》，頁426；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150。東景南《朱子大傳》說朱陸鵝湖之會以來，陸氏兄弟播下和解氣氛。

⁸⁰ 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653；又見《朱子大傳》，頁455。

⁸¹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〇，〈訓門人〉，頁2882。

⁸²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二八，〈陸修職墓誌〉，頁334。

不過對朱、陸而言，劉堯夫信佛，甚至出家，是很大的刺激。⁸³ 象山大約在乾道九年即看到堯夫和其至交陳剛已受佛學的影響，說「如淳叟、正己輩，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⁸⁴ 象山給堯夫信中，也反覆說他「亹亹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亹亹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⁸⁵ 在語錄中，則記有周姓友人問堯夫參禪動機：「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卻皆是這手。」⁸⁶ 這種情況，朱熹在淳熙六年三月也說得清楚，曾說「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淳叟堯夫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⁸⁷ 後來堯夫甚至向朱熹「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引來朱熹批評「『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處。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喚做不知人」。⁸⁸ 簡直背叛師門，最後則逃儒入佛。因此陸九淵在給陳傅良的信中感慨地說「淳叟、正己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眾。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己慕用才術」。⁸⁹ 對陸門弟子的轉變，全祖望在《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四〈奉臨川先生帖子三〉中有很詳細的評述。

另一位則是劉堯夫的至友陳剛。陳剛，字正己，盱江人，他的官歷資料不詳，僅知中進士，為教授，後曾任沅江令及大理司直。⁹⁰ 項安世有詩送他赴京，

⁸³ 關於劉堯夫出家的問題，除陸九淵說「淳叟皈依佛乘」外，未見明確文字，但黃宗義與全祖望均持出家的說法，本文從黃、全之說。見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七七，〈通判劉淳叟堯夫〉，頁2603；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四，〈奉臨川先生帖子三〉，頁5上-6下。

⁸⁴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一二，〈與陳正己〉，頁163。

⁸⁵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四，〈與劉淳叟〉，頁53。

⁸⁶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四，〈語錄上〉，頁408。

⁸⁷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〇，〈訓門人〉，頁2911-2912；東景南，《朱子大傳》，頁429。

⁸⁸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〇，〈訓門人〉，頁2911。

⁸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九，〈與陳君舉〉，頁128。關於劉堯夫與陸、呂、朱關係，參見趙偉，《陸九淵門人》，頁72-75。

⁹⁰ 見蔡幼學，《育德堂外制》（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54冊，據敬鄉樓叢書本排印），卷四，頁11上-下；項安世，《平庵悔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319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後編，卷一，頁10上-下。

可能與任大理司直有關。⁹¹ 從這二文所述「爾夙以學行，推于搢紳，白首入朝，抗志無撓」、「一寸丹心百念更，滿簪華髮萬人驚，閑拋歲月供書冊，長把飢寒為友生」的內容看來，他到晚年才任京官。

陳剛在學術追求上變化甚大。他是象山早年學生之一，依陸象山年譜所載，象山於乾道八年中舉時，追隨者多，陳剛即其中之一，曾至槐堂對傅子淵介紹象山「諄諄只言辨志」。⁹² 次年與劉堯夫有金谿梭山之行，象山有二信致正己，指出「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臥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騁者，皆適以病其心耳」。⁹³ 又批評他與劉堯夫一樣，為學入禪之非「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⁹⁴ 因「與正己相處之久，不敢不直言」。⁹⁵ 說明他是早期追隨的學生，二人相交甚深，故直言其病。⁹⁶ 但後來對他除了學佛之外，兼信功利之說，則有很重的批評。紹熙二年，象山給陳傅良的信，傷嘆劉堯夫之死時，說劉、陳二人，一個皈依佛乘，一個慕用才術，「此其為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己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⁹⁷ 孫應時也向象山詢問「正己議論今何如」，⁹⁸ 都說明象山乃至其門人與陳剛關係益見疏遠。

陳剛又學於呂祖謙。據現有文獻顯示，大約在淳熙五年正己拜見祖謙，祖謙有書信給正己說「從前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吾兄慨然欲力踐之，真斯文之福」，⁹⁹ 鼓勵他「篤實力學」。表示對正己十分欣賞，以致後來朱熹認為陳剛是東萊的門人。¹⁰⁰ 七年十月，陳剛訪呂祖謙，並表明將至五夫向朱熹問學。呂祖謙向朱熹推薦「近有建昌士人陳剛正己相訪，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渠今冬來春為五夫之

⁹¹ 項安世，《平庵悔稿》（收入《宛委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第103冊），卷三，〈送陳正己赴調十月十五日〉，頁27上。

⁹²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89。

⁹³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一二，〈與陳正己〉，頁162。

⁹⁴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一二，〈與陳正己〉，頁163。

⁹⁵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一二，〈與陳正己〉，頁163。

⁹⁶ 繫年見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89，「乾道九年」條。

⁹⁷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九，〈與陳君舉〉，頁128。

⁹⁸ 孫應時，《燭湖集》卷六，頁10下。

⁹⁹ 呂祖謙，《東萊集·外集》卷六，〈與陳正己〉，頁20上。

¹⁰⁰ 朱熹，《朱子文集·續集》卷一，〈答黃直卿〉，頁4903。

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¹⁰¹ 朱熹因祖謙盛讚，有意相見，¹⁰² 但陳剛因突遭母喪，未能到建安，爾後二人並未聯繫。淳熙八年，朱熹得呂祖謙死訊，給劉清之（子澄，1134-1190）的長信中還問「陳正己今在甚處」。¹⁰³

呂祖謙死後，陳剛一面皈依佛教，一面又隨呂祖儉、陳亮（1143-1194）、陳傅良、葉適等人學功利之說。¹⁰⁴ 朱熹曾對黃榦（1152-1221）說：「陳正己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¹⁰⁵ 陳剛更屢屢致書朱熹，表示自己的學術見解，呵斥董仲舒，訕薄二程，頌揚蘇轍、許渤之學。淳熙十二年秋，朱熹有二書答正己，做了很深刻的批評；說他為學大致「蓋上為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為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對「近來浙中怪論蠱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為如何也」，¹⁰⁶ 並批評他的聖賢大業「雖強以聖賢經世之說文之，而規模氣象，與其所謂『存神過化，上下同流』者，大不侔矣」。¹⁰⁷

朱熹同時向多人表達他對功利權術的不滿意見。淳熙十一年朱熹在答潘景逾（叔昌）信中，批評「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若必以為然，即程正叔（頤）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卻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¹⁰⁸ 次年，在答呂祖儉的信中，批判功利之說時提到「陳正己書來，說愈得更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為歎息也。」¹⁰⁹ 同年答學生程端蒙

¹⁰¹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八，〈與朱侍講·三十七〉，頁 31 上-下。繫年見杜海軍，《呂祖謙年譜》，頁 273；東景南，《朱子大傳》，頁 432。

¹⁰²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書引〈答陳正己〉，頁 2569。

¹⁰³ 朱熹，《朱子文集·別集》卷三，書引〈劉子澄〉，頁 5158。

¹⁰⁴ 參見趙偉，《陸九淵門人》，頁 115；東景南，《朱子大傳》，頁 585。

¹⁰⁵ 朱熹，《朱子文集·續集》卷一，〈答黃直卿〉，頁 4903；東景南，《朱子大傳》，頁 585。

¹⁰⁶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陳正己〉，頁 2569-2571；東景南，《朱子大傳》，頁 586。

¹⁰⁷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陳正己〉，頁 2571。

¹⁰⁸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六，〈答潘叔昌六〉，頁 2092。

¹⁰⁹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七，〈答呂子約〉，頁 2159。

（正思）的信說「陳正己之論，何足深辨」，¹¹⁰ 也對他的學生說薛叔似欣賞正己是識人不明：「陳正己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¹¹¹ 從這些文獻顯示，在淳熙年間陳剛雖未正式訪問朱熹，但二人有書信往來，朱熹也對正己轉向功利的學行有深刻的批評。

後來，朱、陳二人互動較多，朱熹對正己的態度有所改變。慶元五年（1199）四月，劉光祖因撰寫〈涪城學記〉中有「世方以道為偽，而以學為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蓋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之語，諫官張釜以佐逆不臣之罪彈劾，遂有被謫貶房州居住之議。¹¹² 朱熹得知後「為之悵然」，託陳剛便中捎書，說「建昌陳剛正己，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寓以此書」。¹¹³ 這是朱熹生命的最後一年，已視正己為奇士，不覺可憎了。但亦未將他視為門人。

黃宗羲（1610-1695）對劉堯夫與陳剛在追求學術方向的轉變，有簡要的說明：「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為莫逆交，正己初學於陸子，已而學于同甫，已而又學于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于正己，故及其狼狽也甚于正己。則以淳叟直為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¹¹⁴ 而在朱熹的眼中，象山學說引導劉、陳向佛，祖謙則使正己趨向功利。但不論如何，都說明劉、陳二人雖皆從學多師，但似乎轉益程度，深淺有別。

（二）石斗文、石宗昭兄弟

石斗文與石宗昭從兄弟也是追從多師的例子。石氏是紹興新昌望族，在兩宋雖不是累代巨富，卻是科舉入仕人數最多的家族之一，且在教育與學術的表現甚

¹¹⁰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〇，〈答程正思〉，頁 2311。

¹¹¹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〇，〈訓門人〉，頁 2912。

¹¹² 佚名，《兩朝綱目備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9 冊），卷五，頁 25 上-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 1352-1353。

¹¹³ 朱熹，《朱子文集·別集》卷一，〈劉德脩十〉，頁 5114-5115，實則劉光祖告休得准，未謫房州。參見束景南，《朱子大傳》，頁 974。

¹¹⁴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七七，〈通判劉淳叟堯夫〉，頁 2603。

為卓著。¹¹⁵ 這個家族先從青州遷會稽，五代時，再徙居新昌，南宋初石公揆曾任左司諫，因論秦檜而死。乾道、淳熙間活躍於政壇與學界的石氏族人，有石礪(1128-1182)與石斗文、石宗昭三人。石氏不僅與當地士族來往密切或建立婚姻，更與名儒密切交往，陶晉生師從《成化新昌志》等史料得知，朱熹與石氏多所交往，有二信致斗文與宗昭，未收入朱子文集中。陳傅良應新昌名族黃度(1138-1213)之聘，開館教育其子弟時，石氏子弟亦受教，葉適也「往來新昌，館於石、呂諸氏」，這也是石氏與此時眾多名儒建立深厚關係的重要淵源。¹¹⁶

石斗文字天民，為石公揆從孫，生於建炎二年(1128)，九歲父死，家貧，母紡織供其讀書，工文詞，在太學十年，有文行，交游者皆一時名人，中隆興元年(1164)進士，先後任台州天台尉、邵武軍司戶參軍、臨安府學教授、漢陽軍學教授等職。淳熙五年三月，史浩復右相，於經筵引陳襄故事，薦石礪、陸仲諤、汪義端、石斗文、沈銖等五人，對斗文的薦詞是「問學知方，行己有恥，不為詭激以釣虛名，涵養之久，必能立事」。¹¹⁷ 斗文獲召赴行，任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論時政，言甚剴切，首批公論不昌，皇帝不信任大臣，親擢朝臣，形成「朝廷得容其私」、「大臣無與進擬」之弊，曾說朝廷「譬之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時成為名言，被稱為「石大門」。因朝廷徵權太甚，私販盛行，影響國計，建議立法務在予民，進而請立經理國政之規模及次第，則其收效自然富國。¹¹⁸ 改通判揚州、婺州。十五年，葉適等五位官員在上執政書中特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其中即包括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石宗昭、楊簡、王枬(1143-1217)、項安世、劉燾、舒璘等重要道學者。¹¹⁹ 約在三月，宋廷任斗文為知武岡軍，¹²⁰ 未上任，得病，次年四月終於家，享年六十一歲。孫應時在代其從弟石應之撰寫的行狀中，稱斗文樂於汲引後進，尤喜講評文辭，越中士人多為其門人弟子。斗文雖長期致力舉業，卻「用意流俗之外，一以古人自期。育德果行，醇粹

¹¹⁵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第十一章〈教育與興盛——新昌石氏〉，頁293-312。

¹¹⁶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306-307；又見孫鏗鳴編，吳洪澤校點，《陳文節公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10冊），「乾道五年」條，頁6410-6411。

¹¹⁷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八，〈經筵薦石礪等劄子〉，頁10上。

¹¹⁸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一，〈編修石公行狀〉，頁8上-9下；朱國禎，《涌幢小品》（上海：中華書局，1959），卷一四，〈石大門〉，頁312。

¹¹⁹ 葉適，《葉適集》卷二七，〈上執政薦士書〉，頁555-556；周學武編，《葉水心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11冊），頁702。

¹²⁰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三，頁15上。

明白」，廣交當代名士，雖年高亦倦倦師慕之，師從者包括張栻、呂祖謙、象山兄弟、陳亮、葉適及朱熹等人。¹²¹

石斗文為象山早期門人之一。淳熙元年（1174）象山任隆興府靖安縣主簿前，致徐誼的書中，指出天民為學駁雜之弊：「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宗昭）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歎，志嚮卻篤，知非甚明，可喜者，亦可為天民慶也。」¹²² 象山對其學問趨向，瞭解甚深。天民與呂祖謙見面，雖見於淳熙元年九月，呂祖謙到會稽，陸門弟子陪同旅遊府學之行，記載見於〈入越錄〉中所說「（九月）六日，偕天民（斗文）、潘叔度（景憲）自寺橋直道過郡庠，道傍多流水。」¹²³ 實則二人認識已久。大約乾道八年，陳亮因營祖父母及母親之墓，無法赴呂祖謙之約見面，¹²⁴ 時任秘書正字的呂祖謙在回信中，提到與周必大、薛季宣、石天民時有往來，他將待斗文送來陳亮家人的行狀，可以為其寫墓誌。¹²⁵

淳熙三年（1176）元月，呂祖謙感謝陳亮慰問其幼弟之喪時提到石斗文：「天民五日離此，徑往新昌會葬」。¹²⁶ 淳熙五年，史浩復相所薦石礪、石斗文，加上葉適、徐元德（居厚）等人中舉，一時為道學人士帶來新的希望。但隨著史浩的罷政，被視為石大門的石斗文，因議政招忌，請求外補，此一變化過程引起呂祖謙、陳亮等人的關切，天民的出處動靜，成為學友討論的重點。呂祖謙在淳熙五年七月致潘景憲（1134-1190）書時，提到「天民、子重召還，於善類牢落，不為無助，但卻是四明論薦，若到此，於交際間亦須斟酌，令淺深得所乃佳」。¹²⁷ 若對照先前祖謙對潘景憲所說「史丞相雖為桀端所擊，而趣召猶未已」¹²⁸ 的說法相連，顯示斗文的出任與史浩有密切關係。到八月以後，情況已有變化。呂祖謙給陳亮的信中提到劉珙（1122-1178）死訊及朱熹獲任知南康時，說「石天民日來蹤跡為人搖撼，方求去，勢須得請」，¹²⁹ 不久又說「君舉去意已

¹²¹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一，〈編修石公行狀〉，頁12上-下。

¹²²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五，〈與徐子宜〉，頁67。

¹²³ 呂祖謙，《東萊集》卷一五，〈入越錄〉，頁7下。

¹²⁴ 時間依方如金，《陳亮與南宋浙東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128。

¹²⁵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頁16上。

¹²⁶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頁18上。繫年依杜海軍，《呂祖謙年譜》，頁180。祖謙幼弟死於淳熙二年十二月，見頁178。

¹²⁷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答潘叔度〉，頁43上。

¹²⁸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答潘叔度〉，頁39上。

¹²⁹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頁22上。

決，但近頗有少曲折，更須放緩兩、三月，乃可申前請也。天民庭怯病，時作時止，甚可念」，¹³⁰ 接著的信則說「某官次粗遣……但朋游散落益復鮮，況適當天民、君舉相繼引去之後，又不欲成群隊，只得癡坐靜待而已。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模散漫，未必能為求田問舍計耳」。¹³¹ 此時所說石天民事，殆與他獲史浩推薦入京任樞密院編修官時，批評朝廷引起當權者反彈，而自請外放一事有關。而任太學錄的陳傅良，改任福州通判，則與推薦他的參知政事龔茂良(?-1178) 被罷有關；雖呂祖謙極力挽留，仍請補外。¹³² 淳熙七年張栻死後，呂祖謙致書項安世，問他是否與石斗文、沈煥往來相聚。¹³³ 後石天民因在揚州通判任上受謗，被罷為主管台州崇道觀，¹³⁴ 返鄉與學友相從甚密，也積極謀起復，祖謙對潘景憲說「天民、叔晦亦似有來意，但艱得缺耳」。¹³⁵ 不論如何，從呂祖謙的書信中，看到石斗文在淳熙年間與陳傅良、沈煥、徐元德相從甚密。

陳亮與石天民的關係也甚為密切。除上述呂祖謙給陳亮書信中看到關切石天民外，更可以在淳熙五年陳亮給石斗文的信中看出。陳亮在信中提到二事，一是石斗文被召，將於二月二十七日被引見召對，希望他與同輩善類均能獲美官，一是對當年進士考試放榜中葉適、徐元德（居厚）、王自中（道甫）中舉，表示高興，也對戴溪（尚望，?-1215）等人落榜感到遺憾。¹³⁶ 對照陳亮給時任秘書郎參與試務的呂祖謙的信就更為清楚。¹³⁷ 同年冬，陳亮給呂祖謙的信，再提到天民與傅良入朝及葉適於閏六月二十三日丁內艱及徐元德致病之事。¹³⁸ 及天民留京任樞密院編修官，陳亮在致吳儼（益恭）書中提到「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

¹³⁰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頁 21 上。

¹³¹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頁 16 上。

¹³² 見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一，〈編修石公行狀〉，頁 9 下；孫鏗鳴，《陳文節公年譜》，頁 6415。石斗文與陳傅良分別為史浩與龔茂良所薦，而史、龔二人不和，對石、陳任用是否造成衝擊，尚待細證。

¹³³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答項平甫〉，頁 26 下。

¹³⁴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一，〈編修石公行狀〉，頁 10 下。

¹³⁵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答潘叔度〉，頁 39 上。

¹³⁶ 陳亮，《龍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1 冊），卷二一，〈與石天民〉，頁 23 下-25 上。

¹³⁷ 陳亮，《龍川集》卷一九，〈與呂伯恭正字〉，頁 21 上-22 上。信中令沈有開（應先，1134-1212）落榜的應即是〈與呂天民〉書中所提到的「應光」之誤。

¹³⁸ 陳亮，《龍川集》卷一九，〈又戊戌冬書〉，頁 25 下-26 上。

津矣」，並提到伯恭、君舉、天民均為其至交。¹³⁹ 淳熙十六年當陳亮得知石天民死訊後，致書呂祖儉說：「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為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¹⁴⁰ 並在祭文中讚天民「英風義概，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¹⁴¹ 乾道九年七月薛季宣死，石天民與石宗昭、高宗商三人為文致祭，稱之為先生，似亦以門人自居。綜合天民與呂祖謙、陳亮、陳傅良、葉適、薛季宣等人交往互動與論學內容看來，天民與浙東功利學派之間的關係是相對密切的。

石斗文除與象山及浙東功利學派諸儒有密切往來外，與朱熹在賑災與論學的互動亦稱頻繁。現存《朱子文集》與《語類》有三條關於石斗文資料，時間從淳熙八年至十三年（1186）。朱熹有二次稱讚天民善於辦理賑貸，即八年朱熹在浙東賑災時，稱讚天民透過保長抄錄飢民的方式，能順利掌握飢民人數，切實賑災，成效很好。¹⁴² 十三年對天民在婺州通判任上領鄉邑賑貸，勇於任事，「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¹⁴³ 另一件則討論為學態度，淳熙九年（1182）朱熹答石天民時，以諸葛誠之為例，對浙中學者認為「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的功利傾向深感驚駭，認為這是「今日之病」。¹⁴⁴ 顯示朱熹對陸學弟子接近功利學風難以認同。無論如何，朱熹肯定天民任事，但對其論學則持批評態度。

石宗昭字應之，是石晝問（1125-1198）之子，詹靖之（康仲）的女婿。¹⁴⁵ 乾道八年進士，是象山的同年。他曾任無為軍軍學教授、秘書省正字、知滁州、度支郎官、樞密院檢詳文字等官，於慶元六年（1200）為朝散大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使，¹⁴⁶ 卒年不明。石宗昭是陸九淵早期的學生之一，深為象山

¹³⁹ 陳亮，《龍川集》卷二一，〈與吳益恭安撫〉：「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頁16下）

¹⁴⁰ 陳亮，《龍川集》卷一九，〈復呂子約〉，頁36上。

¹⁴¹ 陳亮，《龍川集》卷二四，〈祭石天民知軍文〉，頁4上。

¹⁴²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六，頁2643。

¹⁴³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知舊門人問答·答項平父〉，頁2551。

¹⁴⁴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三，〈知舊門人問答·答石天民〉，頁2535。

¹⁴⁵ 陸游，《渭南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00-201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江南圖書館藏明華氏活字本重印），卷三九，〈詹朝奉墓表〉，頁12下。

¹⁴⁶ 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九，〈詹朝奉墓表〉，頁12下。繫年見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448。

所欣賞。¹⁴⁷ 因家族之故，與呂祖謙關係尤密。淳熙元年九月，呂祖謙遊會稽時，宗昭多日從之游。¹⁴⁸ 淳熙八年祖謙逝世，應之時任無為軍軍學教授，曾為文祭呂祖謙，自稱「不肖無狀，得附在弟子之列，八年於茲……向非先生哀其愚而拯之，察其可教而辨之，明誨之詳也，則石火電光安知其不自以為是……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教，庶幾其有分寸之進者，則惟先生之教之賜，不敢忘也」。¹⁴⁹ 文詞甚為懇切哀悼。但這一篇祭文所述學術趨向，後來卻引起象山極大不滿。紹熙元年象山致高應朝的信中，予以強烈批判，說：「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迷繆之甚。急於舊書問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發此以啟之。」後來在臨安官舍中見應之神志不定，「觀其容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¹⁵⁰ 其後在紹熙三年冬天，象山從荊門軍給孫應時回信時，針對應時與宗昭學術傾向的轉變，有很重的批評，說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至今茅塞，每為悼嘆。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至於應時「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也」。¹⁵¹ 可見象山對石應之、孫應時等人在學問上受呂祖謙及朱熹的影響，是深致不滿的。石氏家族與武義呂氏家族為通家之好，宗昭與呂祖儉更是子女親家，紹熙五年正月，呂祖儉有帖致應之，提到應之喪偶，欲其得賢配為內助，信中亦提到其女將適應之之子。¹⁵²

石應之除師事陸九淵、呂祖謙外，也師從薛季宣和朱熹。薛季宣與石斗文、石應之從兄弟的關係密切，且過從可能早於陸、朱。約在乾道三年（1167）他即

¹⁴⁷ 袁燮，〈陸九淵年譜〉，「乾道八年」條，見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88；又見黃宗義，《宋元學案》卷七七，頁2578。

¹⁴⁸ 呂祖謙，《東萊集》卷一五，〈入越錄〉，頁10上-下。見於記載的有六日、八日、十三日、十四日，並說應之的家在王羲之故宅之後。

¹⁴⁹ 呂祖謙，《東萊集·附錄》卷三，〈祭文〉，頁23下。

¹⁵⁰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一四，〈與高應朝〉，頁188。時間依全祖望說「石應之由秘書省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而《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二之九，宗昭任秘書省正字在紹熙元年。見黃宗義，《宋元學案》卷七七，頁2578；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民國二十五年前北平圖書館影印本複製重印），選舉二二之九，頁4600。

¹⁵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一五，〈與孫季和〉，頁195-196。

¹⁵² 見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39-240冊，據上海涵芬樓借景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重印），卷二二續稿一九，〈呂忠公與石應之帖〉，頁16下。

有書答覆應之關於大學、小學之道。¹⁵³ 六年陳傅良入太學，季宣在回覆陳傅良的信中也說：「忽石應之見訪，出前後兩示緘墨慰拊何，已審知諸公固相縻以學職，誠典學者善意。」¹⁵⁴ 因此乾道九年，薛季宣死時，高宗商、石宗昭與從兄斗文均以門人身分致祭。石應之與朱熹也有密切往來，但相關資料偏晚，最早的紀錄見於淳熙十二年朱熹答應之的信。信中提到應之面對孝宗的奏文，說「所示文字深切詳審，說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不止此，而未足以少回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人力所能與也」。希望他加涵養講學之功，以待機會。再則說明自己得祠祿，及老病之況，但仍為「近時所謂喙喙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¹⁵⁵ 深感憂心。其次則是紹熙元年（1190）六月以後，孫應時給朱熹第三信中提到，春天在臨安看到朱熹給石應之的書信，得知他知漳州的消息，¹⁵⁶ 此時石應之當任校書郎，¹⁵⁷ 然紹熙二年黃榦在給朱熹信中，提到應之外放為知滁州，說「石應之以王黨見逐，徐居厚不知其故，呂子約除籍田令」。¹⁵⁸ 這是丞相留正（1129-1206）假手何澹逐去以王藺為首的勢力。¹⁵⁹ 隱示石宗昭捲入高層政治的人事紛爭之中。到慶元三年（1197），朱熹答石應之的信中提到，石家祖墳確定之事，自己老病及黨禁之禍：「猶恨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暝之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¹⁶⁰ 此時石應之大約由知滁州回朝，改任度支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¹⁶¹ 從朱熹的書信內容，看來他對石應之的政治傾向頗有微詞。

¹⁵³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三，〈答石應之書〉，頁 17 上-18 上。定年依楊世文編，《薛季宣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 10 冊），頁 6379，編者稱「應之名宗昭，季宣學生」。

¹⁵⁴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三，〈答君舉三〉，頁 13 上-下。定年依楊世文，《薛季宣年譜》，頁 6383。

¹⁵⁵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石應之〉，頁 2546-2547。

¹⁵⁶ 孫應時，《燭湖集》卷五，〈上晦翁朱先生書〉，頁 3 上。朱熹於淳熙十六年十二月授命知漳州。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下，頁 971。

¹⁵⁷ 見佚名，《南宋館閣續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5 冊），卷八，頁 28 下。

¹⁵⁸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 90 冊，據元刻延祐二年〔1315〕重修本影印），卷二，〈與晦庵朱先生書〉，頁 5 下。

¹⁵⁹ 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 1018-1019。

¹⁶⁰ 朱熹，《朱子文集》卷五四，〈答石應之〉，頁 2547。

¹⁶¹ 佚名，《南宋館閣續錄》卷九，頁 28 上。

石應之與石天民兄弟均與陳亮及葉適有良好關係。前述葉適與詹體仁（元善，1143-1206）、袁樞（機仲，1131-1205）、羅點（春伯，1150-1194）、馮震武等五人於淳熙十五年七月聯名向周必大等宰執推薦的三十四人中，即有石氏兄弟。余英時認為葉適等人的薦士之舉，是道學家執行孝宗政治部署的奠基工作。這是孝宗晚年道學集團與以王淮為主的官僚集團爭奪權位的重大變動。¹⁶² 石氏兄弟除對道學探討外，尤關注所謂有用之學。陳亮即有信給應之。¹⁶³ 應之與丹陽人鍾將之及其子鍾穎，均有關係，且相與講明道學，也是劉宰的師表人物。劉宰（1166-1239）在為其同鄉好友鍾穎撰寫的墓誌銘中說「慶元初，（宰）以郡掾事故轉運使檢詳石公宗昭於儀真。石問學之粹，蓋余所仰以為師表者。見其言在淮西時，君（鍾）奉親來，相與講學甚久，余以是知君師友淵源，非苟於為學者」；¹⁶⁴ 也說「（鍾將之）在滁陽（按指任滁州通判），郡守石公宗昭常從呂太史、朱侍講游，析理精甚。石雖以父行視公，公不以齒自負，相與講切，至窮日夜，故理益明。」¹⁶⁵ 總之，從師從的對象看，石氏兄弟雖同為陸九淵早期門人，但也問學於呂祖謙、薛季宣與朱熹等人，且偏於事功，¹⁶⁶ 不僅他們自視為祖謙門人，明初宋濂也持同樣看法。¹⁶⁷

（三）諸葛誠之兄弟

諸葛千能兄弟同為象山的早期學生。諸葛千能，字誠之，會稽人，為著名藏書家諸葛行仁之族人。¹⁶⁸ 千能與孫應時同鄉，且為太學同學，生卒年及官歷不

¹⁶²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下冊，頁270-304。

¹⁶³ 見陳亮，《龍川集》卷二一，〈與石應之〉，頁25上-26上。

¹⁶⁴ 劉宰，《漫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0冊），卷三一，〈故知建昌軍朝議鍾開國墓誌銘〉，頁9上-下；又見黃宗義，《宋元學案》卷七七，〈知軍鍾先生穎〉，頁2607。

¹⁶⁵ 劉宰，《漫塘集》卷三〇，〈故通判滁州朝散鍾大夫墓誌銘〉，頁9上-下；又見劉宰，《京口耆舊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1冊），卷五，頁22下。

¹⁶⁶ 趙偉，《陸九淵門人》，頁64-65。

¹⁶⁷ 宋濂著，蔣超編，《文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3-1224冊），卷一四，〈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頁16上。

¹⁶⁸ 諸葛行仁於紹興五年九月獻書萬餘卷，事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5-327冊），卷九三，「紹興五年九月甲戌」條，頁2上-下；沈作寶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7冊，據宋嘉泰元年〔1201〕修，清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影印），卷一六，〈求遺書〉，頁27上-下。

詳，僅知他為淳熙八年黃由榜進士。¹⁶⁹ 中舉後，仍居鄉待闕。次年朱熹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推動救荒，諸葛千能以鄉官的身分，請求置倉及減和買絹以紓民困。朱熹曾說：「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誠之和其他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朱熹依旨建立社倉「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婣任卹之風」。¹⁷⁰ 誠之協助朱熹改變紹興府和買絹獨課田畝不及浮財之弊，欲改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向朝廷奏請減和買狀。請諸葛千能「操筆為之」，稱他「有學行，審細詳練，恐可招而問之，必能博盡異同，得其利病之實」。¹⁷¹ 及誠之出任嘉興縣主簿，與知縣黃度及陳希、杜申、劉允濟共同協助知平江府羅點從事救災。羅點的這些屬下均「有志於民者」，深獲羅點的倚用，受到他的推薦，¹⁷² 此後則不見誠之歷官資料。

諸葛誠之早在乾道八年就從學於象山。陸九淵在中舉後，六月十九日離開臨安，「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楊簡），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侍下」。¹⁷³ 同年，象山答誠之之兄受之書中，說「誠之遠訪，辱惠書，欣懌兼至。誠之為學，今世鮮見，好善如此，所當輕千里而告之以善者，況其千里而來見耶，則力之所及，豈敢不自竭」。¹⁷⁴ 從乾道八年到淳熙八年的九年間，誠之在致力舉業的同時，也向象山問學，二人關係相當密切。《象山集》中有三封致誠之的信，雖然《陸九淵年譜》未見繫年，但大約都在此一時期。象山在信中對誠之有勸有勉，如說誠之「惟知頓身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痛鋤狂妄之根」的努力，值得讚許，但對如何鋤去，及此根是否復生，當須辯明；同時稱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¹⁷⁵ 但也說他「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

¹⁶⁹ 張昊纂修，《寶慶會稽續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據宋寶慶元年〔1225〕修，清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影印），卷六，〈進士〉，頁11下。

¹⁷⁰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九九，〈勸立社倉榜〉，頁4844。

¹⁷¹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一八，〈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頁613；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740。

¹⁷² 袁燮，《絜齋集》卷一二，〈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崇仁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累贈太保羅公行狀〉，頁10下-12上。

¹⁷³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四，〈與王德修〉，頁52。

¹⁷⁴ 袁燮、傅子雲初稿，李子願編，《象山陸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9〕，第31冊，據明嘉靖三十八年刻本影印），卷上，〈乾道八年壬辰·答諸葛受之書〉，頁13下。

¹⁷⁵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四，〈與諸葛誠之〉，頁49-50。

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¹⁷⁶ 又說「承諭為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希望他「覺即改之」。¹⁷⁷ 從信的內容，顯示象山對誠之言行觀察十分深刻，獎勸相兼，視之為忠誠的追隨者。除師從象山外，誠之與呂祖謙也有交往。淳熙八年三月八日，呂祖謙有文送誠之，關係不明。¹⁷⁸ 但從爾後的發展看來，諸葛誠之不僅與功利派學者交往，且受其影響。

淳熙八年以後，誠之與朱熹互動頻繁。在論學方面，朱熹對他雜糅象山心學與功利學風，頗有批評。淳熙九年，朱熹在答劉燾（晦伯）的信，就說：「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為學道之障也」。¹⁷⁹ 同年，在給石斗文的信中，對浙中學風別有一種議論「心竊怪之」，特別以誠之為例，說他「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曾子之言，例遭排擯……熹竊以為今日之病，唯此為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為吾患也」。¹⁸⁰ 十年三月，諸葛千能與包揚（顯道）向朱熹問學，朱熹有信致象山，說「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為多，幸甚」。¹⁸¹ 十一年朱熹答梁瑑（文叔）關於皇極之說時，說「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¹⁸²

諸葛誠之曾努力消弭朱陸之間的緊張關係。當淳熙十年五月，朱熹為被陸學弟子視為叛徒的曹建作墓表，¹⁸³ 且明白表述曹立之學問轉變的過程，引起陸學弟

¹⁷⁶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四，〈與諸葛誠之〉，頁 51。

¹⁷⁷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四，〈與諸葛誠之〉，頁 51。

¹⁷⁸ 見杜海軍，《呂祖謙年譜》，頁 280。

¹⁷⁹ 朱熹，《朱子文集·續集》卷四，〈答劉晦伯〉，頁 4971。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 213。

¹⁸⁰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三，〈答石天民〉，頁 2535。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 212；又見東景南，《朱子大傳》，頁 500-501。

¹⁸¹ 袁燮，《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上，「淳熙十年」條，頁 554；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 494；又參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 764。

¹⁸²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四，〈答梁文叔〉，頁 1954。

¹⁸³ 曹建死於十年二月十五日，朱熹作墓表，見《朱子文集》卷九〇，頁 4398-4400。作於五月，繫年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 760。參見陳來，《朱熹哲學研究》，頁 304-311。

子不平，加深彼此對立的態勢。¹⁸⁴ 其中，「顯道（包揚）甚不以為然」。¹⁸⁵ 象山在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有答朱元晦書，對朱熹寫的曹立之墓表，認為有未得實處，擬錄送一份自己所述立之生平，供朱熹參考。¹⁸⁶ 諸葛誠之也致書朱熹，試圖化解朱、陸的關係。朱熹為此於十三年有二書答覆誠之，說「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論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並對陸學弟子「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因感「諸賢之氣方盛，……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對誠之表示所以至此，肇因於「羈心害道」，深有同感，但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才有異同，便成嫌隙也」。¹⁸⁷ 十三年，朱熹給項安世的信中，同樣抱怨陸學弟子不理性的攻擊，說「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¹⁸⁸ 因此黃宗羲說誠之「嘗以書貽朱子論曹立之墓表事，欲解兩家之爭」。¹⁸⁹ 不過從事情的發展看來，諸葛誠之並不能有效化解雙方的矛盾與分歧。

諸葛誠之大約死於淳熙十六年，孫應時在〈祭諸葛誠之文〉說二人不僅同鄉，且自太學起即相交「義重金石，情通墳簞」，並述及彼此交往與情誼，特別對淳熙九年以後，二人的遭遇與相互關懷的情誼，有很深的描述。¹⁹⁰ 顯示兩人交情甚篤，互動頻繁。

諸葛誠之有兄字受之，佚其名，仕歷資料不詳，也是象山門人之一。乾道八年，象山有書致受之，批評他「反己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似不能自奮也」，並引孟子「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希望他勇於改正「幸無久自屈

¹⁸⁴ 見朱熹，《朱子文集·續集》卷四上，〈答劉晦伯七〉，頁4972。

¹⁸⁵ 見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95。

¹⁸⁶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七，〈與朱元晦〉，頁94-95。繫年見《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96。

¹⁸⁷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諸葛誠之〉，頁2548。但東景南《朱子大傳》作淳熙十六年，恐誤，當以陳來之說為確。見氏著，《朱子大傳》，頁590。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249。

¹⁸⁸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項平父〉，頁2551。

¹⁸⁹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七七，〈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千能、諸葛受之先生□合傳〉，頁2577。

¹⁹⁰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三，〈祭諸葛誠之文〉，頁7下-8下。

黃寬重

抑」。¹⁹¹《宋元學案》歸之於象山門人。¹⁹²受之似較誠之早逝。

（四）高宗商與項安世

高宗商與項安世也是象山弟子中轉益多師的人。關於高宗商與高商老是否為一人，歷來頗有不同意見。《會稽續志》卷六〈進士〉乾道八年黃定榜中，除石宗昭外，有高宗商，但在宗商下，註改名商老。由於此說屬孤證，故後世如《宋元學案》等多分作二人，趙偉在《陸九淵門人》中，亦認為是二人，以《會稽續志》之說為誤。¹⁹³但宗商與商老的字均是應朝。在淳熙時期，名諱是「宗商」。「商老」之名，首見於蔡戡（定夫，1141-?）推薦任知廣西象州，此後的資料均稱「商老」。綜觀二者的資料，當為同一人。

高宗商字應朝，越州括蒼人。乾道八年進士，為新明州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¹⁹⁴待闕在家，後任徽州錄事參軍，丁憂。¹⁹⁵約淳熙十年，為邕州教授，項安世有詩相送。¹⁹⁶友人舒琪（元英，舒璘弟）死，楊簡與宗商致祭，¹⁹⁷後權知象州。約淳熙十二、三年任湖廣總領的蔡戡曾薦宗商，說他「行義著聞鄉閭，才術見推流輩，文學吏事皆有過人，頃宰劇邑，已著能稱，前後守臣，以其政績上聞……今為象臺……田野為之加闢，以至興修學校，繕治城池，鼎新軍營，易茆以瓦，區處有方」，¹⁹⁸說明宗商在廣西不論在教學或實務建設的成效，均獲肯定。項安世有詩寄商老。¹⁹⁹紹熙五年（1194）知宜興縣，曾復養士橋錢，²⁰⁰重

¹⁹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與諸葛受之〉，頁45；參見《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89。

¹⁹² 黃宗義，《宋元學案》卷七七，頁2577。

¹⁹³ 趙偉，《陸九淵門人》，頁186-187。

¹⁹⁴ 薛季宣，《浪語集》卷三五，頁5上。另項安世，《平庵悔稿·後編》卷一，〈小隱莊別高教授〉，頁3下-4上；及〈次前韻饒高教授〉，頁4上；亦為送邕州詩。

¹⁹⁵ 項安世，《平庵悔稿·後編》卷三，〈高通直挽詩高應朝之父〉，頁18上-下。

¹⁹⁶ 項安世，《平庵悔稿》卷四，〈送邕州高教授二首〉，頁18下。繫年見馮可鏞、葉意深編，李春梅校點，《慈湖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10冊），頁6605-6606。

¹⁹⁷ 又見黃宗義，《宋元學案》卷七七，〈教授高先生宗商〉，頁2595。

¹⁹⁸ 蔡戡，《定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7冊），卷六，〈薦高商老、周南、劉燦狀〉，頁25上。繫年見胡坤，《制度運行與文書流轉：宋代薦舉改官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稿），頁99。

¹⁹⁹ 項安世，《平庵悔稿》卷四，頁18下。

²⁰⁰ 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3冊，據宋咸淳四年〔1268〕修

修縣學，以二千五百石設社倉，顯然是接續朱熹及理學同道，共同致力救助鄉里的理想。²⁰¹ 朱熹為文稱他「躬為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²⁰²「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²⁰³ 開禧三年(1207)知撫州，因追慕象山，以其堂名為「景賀堂」，²⁰⁴並刊刻象山文集於郡治，為之序。²⁰⁵ 同年十一月，與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憚（伯和，1155-1212），奏辟朱熹女婿黃榦知臨川縣事，說他「稟資公正，律己廉勤，使宰百里，綽有餘才」。²⁰⁶ 但高宗商到次年（嘉定元年）初，被劾罷，²⁰⁷可能抑鬱而終。黃榦有文祭他，說「惟公稟剛直不撓之德，博碩有用之才，而位不顯，年不壽，此榦所以為公惜也……公其死矣，顧使齷齪庸凡之徒紛起而謀天下之事，是則重可為斯世惜也。千里緘詞，一觴遣奠，公其以為真知我者哉」。²⁰⁸ 為宗商的英年早逝，無法展佈長才抱屈。

高宗商是象山的同年進士，也是早期的門人之一。《象山年譜》說乾道八年「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宗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游」。²⁰⁹ 尤與楊敬仲、舒元質相契，²¹⁰與石宗昭關係亦密切。高應朝對象山甚為折服，說「先生之文如黃鍾大呂，發達九

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趙懷玉刻李兆洛校影印），卷二九，〈碑碣·宜興〉，頁12上。

²⁰¹ 劉宰在〈回宜興謝百里（奕修）〉中也指出「紹熙間，越人俞、高兩郎中相繼為宰，創社倉。二君既去，鄉人徐大夫實繼之。徐雖學舍人，而識頗不逮，遂徹去。人至今惜之，至今議之。」見氏著，《漫堂集》卷六，頁11上。

²⁰²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八〇，〈常州宜興縣學記〉，頁3973。

²⁰³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八〇，〈常州宜興縣社倉記〉，頁3974。南宋朱子門人及理學同道致力於社會推廣，參見梁庚堯，〈南宋的社倉〉，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下冊，頁424-473。

²⁰⁴ 項安世，《平庵悔稿》卷四，〈和高撫州用韻相招〉詩中說：「高侯師事象山陸先生，自號景賀堂」。（頁12下）

²⁰⁵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518-519。

²⁰⁶ 鄭元肅錄，陳義和編，吳洪澤校點，《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11冊），頁7213。

²⁰⁷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二九，頁4065。

²⁰⁸ 黃榦，《勉齋集》卷三六，〈祭高應朝文〉，頁11下-12下。

²⁰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88。

²¹⁰ 黃宗義，《宋元學案》卷七七，〈教授高先生宗商〉，頁2595。

地，真啟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不傳耶」。²¹¹ 象山有二書與宗商論學兼評人事，均及於石宗昭。第一封的時間待考，主要在回答應朝的書信，鼓勵他為學日進，說「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礪，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為無傷也」。接著批評呂祖謙「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但在答石宗昭書中未及此。大概擔心二人受呂氏兄弟的影響。²¹² 第二封約在紹熙元年，除了談到陸九韶之子的死訊外，更對高宗商與石宗昭二人的學術態度擔心「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興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迷繆之甚……觀其容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閱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²¹³ 象山的擔心顯然有跡可尋。高、石二人實亦曾隨呂祖謙及薛季宣游。乾道九年（1173），薛季宣死時，石氏兄弟與宗商，以弟子身分致祭。²¹⁴ 而呂祖謙在淳熙元年（1174）到會稽旅遊時，石氏兄弟與宗商、應時等人均隨游。²¹⁵

高宗商亦曾問學於朱熹，且關係密切。高宗商將他教育邕州及象州州學弟子時所編的講義，寄請朱熹指正，而非象山。²¹⁶ 淳熙十三年，朱熹在回信中對講義的內容有褒有貶，既說「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卻也擔心有負作用「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即恐學者……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²¹⁷ 但宗商在廣西興學之舉顯然讓朱熹留下印象，不僅在給廣西安撫使詹儀之的信中說「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²¹⁸ 而且在紹熙、慶元年間，應朝任知宜興縣時，修縣學與設社倉，均得到朱熹的肯定，特別為他寫下二篇記文。在〈縣學記〉中，朱熹說「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故已樂為之書矣。」²¹⁹ 顯示

²¹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五，〈語錄下〉，頁471-472。

²¹²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五，〈與高應朝〉，頁64-65。

²¹³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一四，〈與高應朝〉，頁188。

²¹⁴ 薛季宣，《浪語集》卷三五，〈從政郎新漢陽軍軍學教授石斗文迪功郎新州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高宗商迪功郎新州司戶參軍石宗昭〉，頁9上-10上。

²¹⁵ 呂祖謙，《東萊集》卷一五，〈入越錄〉，頁7下。

²¹⁶ 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246。朱熹答廣西安撫使詹體仁第三封信中所示，參照蔡戡的薦舉，則答宗商信約在十二、三年間，見東景南，《朱子年譜長編》，頁846-847，作淳熙十三年五月。

²¹⁷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三，〈答高應朝〉，頁2534。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260。

²¹⁸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二七，〈答詹帥書三〉，頁1037。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246。

²¹⁹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八〇，〈常州宜興縣學記〉，頁3973。

兩人當相識於淳熙八年間。此一機緣，加上與象山的距離拉遠及奏辟黃榦知臨川縣，顯示高宗商在師從上轉向的痕跡，相當明顯。

項安世雖被列名象山門人，但與象山的關係相對疏遠。項安世字平文，一作平甫，號平庵，越州括蒼人，遷江陵，生於紹興二十三年（1153），死於嘉定元年（1208），享年五十七歲。²²⁰ 淳熙二年（1175）與孫應時同榜進士，旋任會稽教官。先是淳熙元年八月，呂祖謙赴紹興外祖母家省親，即因其大舅曾逢之介紹，知道安世的才學。曾逢愛安世之才，相繼介紹給朱熹與張栻，²²¹ 這當是安世結識當世大儒的重要淵源。七年七月，安世改山陰教官，與浙東學者往來甚密，和石斗文、沈煥二人尤相友好。呂祖謙因疾請祠，在婺州修養，有書答安世說「某往歲侍郎舅氏自荆南歸，具道左右年雖少而志操堅正，下至諸表弟，人人敬慕，是時慨然有願見之意。今春（七年）聞分教山陰，相距離不遠，又以病廢無從面為恨……自張丈去世之後，至今心折。左右游從既久，講繹必甚精詳，然願深思力踐，體衣錦尚絅之義，卑以自牧，馴致充實光大之地，則吾道之幸。」²²² 從祖謙的信中知道，安世在江陵與曾幾之子孫均熟識，並深受肯定。祖謙並指出安世隨張栻游從最久，希望他力踐所學。²²³ 南軒逝世時，安世有詩弔挽，言詞懇切，²²⁴ 顯示項安世在荊州受教於張栻，學有淵源。及安世任官紹興，進一步與葉適、陸九淵、朱熹等道學大儒及東南士人接觸。元人徐明善（1250-?）在〈項廷實汝南類編〉即說「平父所事者，朱張呂陸，皆繼孔孟之傳者，所友者楊敬仲、沈叔晦、呂子約、楊子直，皆淵源鄒魯，羽翼伊洛者」，²²⁵ 說明安世交游與學術脈絡之廣。安世的行政能力與學識亦受肯定，淳熙十年，朱熹在答劉燾書中提到張詔

²²⁰ 項安世生年向不可考，唯據《陸九淵年譜》淳熙十年項書云：「某……今年三十一。」推算當生於紹興二十三年，見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94。

²²¹ 柳貫，《待制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0冊），卷一八，〈跋江陵項平甫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頁20上。曾逢為呂祖謙外祖父曾幾（號茶山）的長子，曾幾的墓誌由其弟子陸游所撰，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誌銘〉，頁8下-18上。不過，呂祖謙至紹興探外祖母多次。在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赴越，曾與其舅曾逢、曾逮聚會，當已獲介紹知道安世，三年十月，再赴外祖母家省親，見杜海軍，《呂祖謙年譜》，頁143-145, 192。

²²²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答項平甫〉，頁26下。

²²³ 繫年見杜海軍，《呂祖謙年譜》，頁268。

²²⁴ 項安世，《平庵悔稿·後編》卷三，〈挽荊南帥張左司詩〉，頁19下-20下。

²²⁵ 徐明善，《芳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卷三，〈項廷實汝南類編〉，頁40下。

在浙東任提舉刑獄時，因他的推薦，讓楊簡、孫應時和項安世，都獲張詔的舉薦。²²⁶ 同年四月，朱熹武夷精舍成，項安世與諸友均有詩唱和。²²⁷ 十四年，朱熹給尤袤（1124-1193）的信就說「項平父向來紹興，同官中極不易得，來教所謂可用之才，誠不易之論」。²²⁸

呂祖謙病逝後，項安世轉從學於陸九淵與朱熹，因此被《宋元學案》同列入朱陸門人。²²⁹ 項安世在淳熙九年曾給陸象山信，對朱陸二人發揚道學有深切期待，說：「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憤，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弟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己。雖未得親承於警欬，然受沾渥亦已多矣。……一、二年來，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與朱先生耳」。²³⁰ 同年，象山回信給安世解釋孟子揠苗助長之意，特別強調「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²³¹ 此後安世與陸象山論學，資料不多，只見於淳熙十二年象山給包顯道書中提到九齡及其子相繼病死，及劉堯夫任官曲折變化時說「所報項平甫之言，乃明越間謬人妄說耳」。²³²

相對的，項安世與朱熹的往來則更頻繁。先是安世致書朱熹說明學習心學所得，朱熹在淳熙九年、十年有二書對安世表明自己與象山學術差異的根本處，說「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則只恃一個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²³³ 自己與象山之別在「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²³⁴ 淳

²²⁶ 朱熹，《朱子文集·續集》卷四上，〈答劉晦伯〉，頁4971。

²²⁷ 見東景南，《朱子年譜長編》，頁769。

²²⁸ 朱熹，《朱子文集·續集》卷五，〈答尤尚書〉，4995。

²²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93。全祖望說：「項平甫來往於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見氏著，《鮑崎亭集·外編》卷四四，〈奉臨川先生帖子二〉，頁4上。參見趙偉，《陸九淵門人》，頁162-164。

²³⁰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93。

²³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五，〈與項平甫〉，頁66。

²³²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七，〈與包顯道〉，頁100。

²³³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項平父〉，頁2549-2550。時間亦為淳熙九年，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213。參見東景南，《朱子大傳》，頁588。

²³⁴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項平父〉，頁2550；又見陸九淵，《陸九淵集》

熙十三年朱熹又有二信給安世。其一是朱熹因曹立之墓表，引發陸學子弟批判，向安世抱怨「罵坐之說，何乃至是？……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諸葛）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²³⁵ 另一書則針對安世請教讀書次第發表意見。他批評近世學者強調博觀，而以內省為隘狹之非，認為更宜重省察工夫。²³⁶ 這兩封信是安世在東南任官滿期，欲西歸荊州時。

淳熙十五年七月，葉適等五人聯名向執政推薦的三十四位士人即有項安世。安世被召入朝，《貴耳集》即說「孝宗末年宰相奏試館職。聖語可求二人遠方入試。吳獵，字德夫，潭州人。項安世，字平甫，荊南人。」²³⁷ 次年五月，周必大罷相，安世與葉適、尤袤等相繼去國。²³⁸ 至紹熙二年，孫逢吉（1135-1199）任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曾薦安世與吳鎰、方銓、徐應龍（?-1224）等人。²³⁹ 約於紹熙三年安世被召回朝。安世在對策的表現，讓在長沙的周必大甚為興奮，周必大致孫逢吉的信中提到宰相趙汝愚許用安世，且安世的對策表現極佳「要是學問文采氣節參備，乃能如此」，²⁴⁰ 並在十一月向汝愚探詢「館職豈易得耶」。²⁴¹ 可見必大對安世才學賞識備至。在必大力薦下，安世終被任為秘書正字。

項安世回京後與朱熹有頻繁的請問互動。安世曾就「義襲」發表意見，並請教，朱熹在覆函中說安世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調理只如此，所以為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強調「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為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²⁴² 紹熙四年周必大在離長沙前致

卷三六，〈年譜〉，頁 494。時間當在淳熙十年。四部叢刊本作「問學」，但明以後著作，引述此語，均作「道問學」。

²³⁵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項平父〉，頁 2551。

²³⁶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項平父〉，頁 2551。

²³⁷ 張端義，《貴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5 冊），卷中，頁 8 上。

²³⁸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 962。

²³⁹ 樓鑰，《樓鑰集》卷一〇二，〈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頁 1779。

²⁴⁰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九二，〈孫從之提刑〉，頁 22 下。繫年見樓鑰，《樓鑰集》卷一〇二，〈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頁 1779。孫應時在四川也向安世索取對策，可見安世表現甚佳，見孫應時，《燭湖集》卷七，〈項大卿〉，頁 19 下。

²⁴¹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九一，〈趙子直丞相 紹熙三年十一月〉，頁 28 上。

²⁴²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四，〈答項平父〉，頁 2553。

安世書，即盛讚他的奏章「謹讀數過，意婉義深，學廣文瞻，歎服不已。」²⁴³此時，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請「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間爾。」²⁴⁴不報，請辭，遷秘書郎。這段期間，安世與朱熹等人多有交游。²⁴⁵五年閏十月十九日，朱熹除宮觀，安世作〈落梅花〉詩相贈，嘆曰：「十畝寒林一樹梅，自妍自笑已堪哀，朝來更被風吹卻，擬遣春從底處回，野外籬邊爛漫香，晚風孤影美霓裳，飛花滿地無人管，卻趁春泥上燕樑」，²⁴⁶並與史院同僚李壁（1159-1222）、葉適、汪達、樓鑰、黃由等人，餞別朱熹於靈芝寺。²⁴⁷

當孝宗駕崩，光宗無法執喪時，曾引起宋廷極度紛擾，包括留正等朝中大臣均相繼出京，項安世也是其中之一。周密（1232-1298）記〈紹熙內禪〉中即說「中外人情洶洶，以禍在旦夕，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數人，如李祥等搬家歸鄉者甚眾，侍從至欲相率出城」。²⁴⁸按《宋史》本傳，安世是遺書宰相留正求去的。後遷校書郎。²⁴⁹寧宗即位，安世應詔，建議省費，「首省兵費，次省官掖之費」。當時朱熹被召又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不報。及朱熹既去，項安世與劉孟容（心度）都被劾。朱熹在致蔡元定（季通）書說此事「必是理會道學公事」，結果「項罷新任，劉補外也」。²⁵⁰慶元二年（1196）六月，安世與知吉州楊方均被降兩官放罷，理由是「適當危疑之時，懷私自營，不顧君上，委之而去，逮其事定，相繼復來」，²⁵¹正是指責安世於孝宗駕崩，離京之非。改知重慶府，²⁵²又為言者劾去。以偽黨罷，回江陵。²⁵³

²⁴³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八，〈項平父正字 紹熙四年〉，頁5下。

²⁴⁴ 脫脫等，《宋史》卷三九七，〈項安世〉，頁12088。

²⁴⁵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1148-1149。

²⁴⁶ 項安世，《平庵悔稿》卷一二，〈閏月二十一日作落梅花，是日有旨晦翁宮觀〉，頁16下-17上；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1189。

²⁴⁷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1189-1191；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下冊，第十章〈孝宗與理學家〉，頁228-246。

²⁴⁸ 周密著，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三，頁39。

²⁴⁹ 脫脫等，《宋史》卷三九，〈項安世傳〉，頁12088。樓鑰，《樓鑰集》提到：「若棧之聲名發於上庠，獵之才略著於劇縣，安世之節概又士論所推。」見氏著，《樓鑰集》卷三七，〈秘書省正字顏棧秘書郎項安世吳獵並校書郎〉，頁701。

²⁵⁰ 朱熹，《朱子文集·續集》卷二，〈答蔡季通〉，頁4939。

²⁵¹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六五，頁4049。

²⁵² 姜夔有詩相送，見姜夔，《白石道人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5冊），卷上，〈送項平甫倅池陽〉，頁14上-下。《館閣續錄》亦作「通判池州」，見佚名，《南宋館閣續錄》卷八，頁28下；脫脫等，《宋史》卷三九七，〈項安世傳〉，頁

安世在黨禁期間，似怕受牽連，謀迴避與學友關係。黃榦說「先生（按：指朱熹）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獵）、項平父（安世）、楊子直（方）合乞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看得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直前日纔見某人文字，便來勸止，且攢著眉做許多模樣」。²⁵⁴ 最後安世仍以校書郎的身分，被列為偽黨的五十九人黨籍碑中，但他的行徑遭致朱熹的批評。慶元四年（1198）底，蔡璉誣告趙汝愚定策時有異謀，韓侂胄擬藉此興獄，欲捕與汝愚有關係的彭龜年（1142-1206）、曾三聘（1144-1210）、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大理寺，²⁵⁵ 安世驚恐，杜門不出，以為迴避，引起朱熹的不悅。是年冬，時年六十九歲的朱熹，在答李壁書中提到「楊子直得祠又遭駁，項平父聞亦杜門，不敢見人，其他吾人，往往藏頭縮頸，不敢吐氣，甚可笑矣」。²⁵⁶ 次年，朱熹給安世書，說「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²⁵⁷ 顯示對安世在黨禁期間的表現，頗有微詞。慶元六年臥病江陵的安世，從友人包揚送來朱熹為建昌人吳仲、吳倫兄弟作社倉記寫詩時，得知朱熹死訊，「讀之心折，臨筆汪然涕泗交下」寫下沈痛的哀念詩。²⁵⁸

項安世與吳獵（1143-1213）均在開禧北伐期間起復，卻因部屬反目，安世旋遭罷。黨禁期間，吳、項二人雖同列黨籍遭廢，卻因贊成北伐，於韓侂胄發動對金戰爭後，均復任。吳獵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在長沙授業於張栻，與安世同為南軒門人，感情甚佳。²⁵⁹ 淳熙五年七月，劉焯代張栻出任荊湖北路安撫使，南

12088；亦見孫應時，《燭湖集》卷七，頁20上-下。孫應時在慶元三年春，給安世的信中指出，在此一時間，攜全家數十人「謀徙家，漂泊輾轉，竟復西還，老人得不邑邑動心耶，每欲寓一紙問訊，遇便捉筆，嘆息復止。此心可印，亦不待言，即茲春晚，遠惟杜門奉親。」見氏著，《燭湖集》卷七，〈與項大卿書〉，頁20下。

²⁵³ 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405。

²⁵⁴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七，〈內任丙辰後〉，頁2669。在慶元二年。

²⁵⁵ 樵川樵叟，《慶元黨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1冊），頁26上-下；佚名，《兩朝綱目備要》卷五，頁20下-22下。

²⁵⁶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三八，〈答李季章〉，頁1596。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467-468；束景南，《朱子大傳》，頁969。

²⁵⁷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二九，〈與項平父書〉，頁1123。

²⁵⁸ 項安世，《平庵悔稿·後編》卷四，頁28下-29上；束景南，《朱子大傳》，頁1401-1405。

²⁵⁹ 胡宗楙編，李春梅校點，《張宣公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10冊），頁6263。

黃寬重

軒特推薦吳獵，²⁶⁰ 開禧二年，韓侂胄發動北伐，起吳獵帥荆渚，安世起復知鄂州。詩詞名家張鑑（1153-?）以〈滿江紅·賀項平甫起復知鄂渚〉詞送之，曰「說項無人堪嘆息，瞻韓有意因恢復。用真儒，同建太平功，心相屬」，²⁶¹ 正印證了安世黨附韓侂胄之說。及宋師潰於淮漢，宋廷任安世為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率兵解德安之圍。及薛叔似罷，吳獵代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而由安世權宣撫使，升太府卿。張鑑賦〈水調歌頭·項平甫大卿索賦武昌凱歌〉相贈，有「暢皇威，宣使指，領全師，襄陽耆舊，請公直過洛之西」期其凱旋而歸。²⁶² 後與吳獵因部屬反目，吳訴於朝，安世坐免落龍圖閣，並降為奉議郎。²⁶³ 嘉定元年（1208）卒。

（五）潘友文與王遇

潘友文與王遇二人雖曾師從象山，但與朱熹的關係更為密切。潘友文，字文叔，是金華人，潘良貴諸孫，李光女婿潘時之從子，與時之子友端（端叔）、友恭（恭叔）為從兄弟。三人雖是同族，且關係密切，但從學習過程，友端、友恭兄弟，與朱熹關係密切，且學問更接近朱熹，相對的與象山關係則較為疏遠，故多被列為朱子門人。友文則學於象山，但取向較為多元複雜。

潘友文的生平及仕歷，由於資料之限，所知無多。王柏說他是半山翁潘旬之長子，和王柏的祖父為至交，未見科舉記載，殆以恩蔭入仕。最早的仕宦紀錄，見於他任信州永豐縣令時，為褒旌靖康勤王而死難的名宦張叔夜與鄭驤，建「旌忠愍節廟」，請朱熹寫碑記，及請陳亮為他重建永豐縣社壇所作〈信州永豐縣社壇記〉，時間在紹熙四年。²⁶⁴ 他也曾任平江府崑山縣宰。在任上，為政寬厚，慈

²⁶⁰ 見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04-207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重印），卷八九，〈數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行狀〉，頁 2 上。繫年見胡宗楙，《張宣公年譜》，頁 4323。

²⁶¹ 張鑑，《南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4 冊），卷一〇，頁 17 下；曾維剛，《張鑑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 235-236。

²⁶² 張鑑，《南湖集》卷一〇，頁 15 上；曾維剛，《張鑑年譜》，頁 235-236。

²⁶³ 見蔡幼學，《育德堂外制》卷一，〈項安世落直龍圖閣〉，頁 12 上-下；卷二，〈項安世降奉議郎〉，頁 1 上。制詞指「爾往以材選，經營上流。而宣威之臣，與中執法，歷陳爾過，朕疑於用舍之際，蓋久而後決焉。爾休於家而言者不置，且謂爾縱下為虐，豈朕所望於儒者哉，尚體隆寬，毋忘自省」。

²⁶⁴ 朱熹之作見《朱子文集·正集》卷八九，〈旌忠愍節廟碑〉，頁 4374；陳亮之作見《龍川集》卷一六，〈信州永豐縣社壇記〉，頁 1 下-2 下。

祥愛人，俗稱為潘佛子，任滿，百姓爭結綵樓於路，號曰：去思。²⁶⁵ 嘉定二年（1209）八月，由諸軍糧料院出任知真州，曾請朝廷旌表揚子縣民吳汝明。²⁶⁶ 真州是南宋淮南邊防重鎮，雖經林伯成、郭超修築，但未完成。開禧期間，城池受創頗重，兵荒饑饉之餘，幾不成邦。友文奉命安集百姓、築城鑿池與修造府廨，「巋然與維揚相為長雄，是為邊庭之壯觀」。²⁶⁷ 樓鑰在〈真州修城記〉中，對友文先世與仕歷，有較清楚的描述「惟潘氏自紫微舍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賞延，俱為時吏師。先正柯山使君能輕財重義，君實似之。自其幼年躬行孝謹，篤志問學，有不可解於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去之日無以續食。及倅京口，以荒政自任，民以父母稱之。……使守邊者誠心體國，皆能如君，何有北顧之憂哉」，²⁶⁸ 對他的政績讚譽有加。

潘友文在福建有嘉政，為閩人所欽服。真州卸任後，潘友文改任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時宋廷行秤提法，友文亦行於閩地，攝建陽尉的邵武人杜杲（1173-1248）致書表示「公奉新書太過，八郡騷動矣」，友文即弛其禁。²⁶⁹ 此事對閩人嘉惠甚大，理宗時，方大琮（1183-1247）曾致書莆田縣令苑鎔，批評推行秤提騷擾地方「官司造舟之擾，秤提之擾，保社市井苦之，而勇於奉行者不自知，某則謂此正先儒寬一分之時」，並舉文叔為例，說「嘉定行令初，潘文叔攝漕事，自出巡點，邦人荷賢守之賜甚多，父老猶有記其事者否」。²⁷⁰ 可見友文的作為讓閩人留下深刻印象。

潘友文的師從頗多，包括薛季宣、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和朱熹等人。陳亮在〈信州永豐縣社壇記〉中引辛棄疾的話盛讚他，「愛其民，如古循吏」，說他除家學外，更從學於當代三位大儒「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菴，是世所謂三君子者。」²⁷¹ 友

²⁶⁵ 見項公澤修，凌萬頃、邊實纂，《淳祐玉峯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據宋淳祐十一年〔1251〕修清宣統元年〔1909〕《匯刻太倉舊志五種》本影印），卷中，〈名宦〉，頁14下。

²⁶⁶ 徐松，《宋會要輯稿》，禮六一之一三，頁1693。時間為嘉定四年九月六日。

²⁶⁷ 樓鑰，《樓鑰集》卷五一，〈真州修城記〉，頁958-959。

²⁶⁸ 樓鑰，《樓鑰集》卷五一，〈真州修城記〉，頁959。

²⁶⁹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11-216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舊鈔本重印），卷一四一，〈杜尚書（杲）〉，頁7下。

²⁷⁰ 方大琮，《鐵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8冊），卷一九，〈苑鄉守（鎔）〉，頁5下-6下。

²⁷¹ 陳亮，《龍川集》卷一六，頁2上-下。

文的好友趙蕃 (1143-1229) 也強調其家學與師從關係：「斯文呂與張，用世故落落，年來踵蒿原，天意亦已虐，君嘗登其門，如戶發管籥，何當傳相授，此道得深酌」，²⁷²「斯文失張呂，吾道屬朱劉」。²⁷³ 不過從現存的文獻，未見呂祖謙與之論學的資料。張栻則大約在乾道年間，有書教友文如何處理心神渙散的毛病「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²⁷⁴ 友文從學於薛季宣的紀錄也很明確，現存《浪語集》保留一份季宣約在乾道四年 (1168) 回永嘉待闕時給友文的信，說「茲蒙華翰之貺，辱臨之以師弟子禮」。知道當時二人未見面，但友文主動求師，季宣則客氣的說「又蒙于某求師，某學焉不足，顧將何以為獻？懼塗公之耳目，無以祇復將命，切幾照亮」。²⁷⁵

潘友文向朱熹問學的相關資料較多。從《朱子文集》中不僅看到前述紹熙四年所撰的〈旌忠愍節廟碑〉，另有四封答友文論學的書信，據陳來考訂，均在淳熙十三年。朱熹在信中讚賞友文檢討自己為學利病，勸他「便當實下工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必不如此論量計較，卻成空言，無益己事也」，並闡述大學格物致知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己心光影，便為天命全體也」。甚至批評他「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希望等他官期任滿，相見時再詳談。²⁷⁶ 從信的內容看來，朱熹視友文為門人，坦然相告，因此不但陳亮視之為朱子門人，連王柏也予以確定：「考亭設教，多士景從……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恭叔，半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公獨少，止書三答而已」，²⁷⁷ 又說「公（文叔櫟庵）嘗登考亭之門，亦有答問，近為好事者所

²⁷² 趙蕃，《淳熙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5 冊），卷一，〈寄答潘文叔並屬恭叔五首〉，頁 28 上。

²⁷³ 趙蕃，《章泉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5 冊），卷二，〈寄送潘文叔恭叔二首〉，頁 31 上。

²⁷⁴ 張栻，《南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卷二七，〈答潘文叔〉，頁 15 下。

²⁷⁵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五，〈與潘文叔友文〉，頁 10 上。繫年見楊世文，《薛季宣年譜》，頁 6379-6380。唯文中作「潘友之」，誤。

²⁷⁶ 朱熹，《朱子文集》卷五〇，〈答潘文叔〉，頁 2260-2263。

²⁷⁷ 王柏，《魯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6 冊），卷一二，〈跋東邨得朱子帖〉，頁 2 上-下。

有矣」。²⁷⁸ 但細究朱子批評的內容，則顯然喻示友文受象山影響相當深，而要剴切開悟。

潘友文師事陸象山的時間與師徒關係如何，現存象山的兩封書信均難以確定。但從信中看到象山肯定其為人，說「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也欣慰他為學有進步，但對文叔自承「怠墮急迫兩偏」與「恐懼憂驚每每過分」的毛病，均提供導正意見，認為「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主要做的是心正的工夫，「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雖為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觀察友文為文「不免乎其私者也……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²⁷⁹ 從討論的內容看來，象山導正的是學習的根本心態，而朱熹的批評針對性較明顯，殆指友文容象山或兼雜東萊的內涵，或意謂友文從學於象山時間較早。難怪黃宗義《宋元學案》要說「潘文叔實為槐堂之教」。²⁸⁰ 李紱在《陸子學譜》中說「潘友文……從學於陸子，在淳熙末年……文叔兼事朱子，嘗以書問學，有『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遵陸子教也」。²⁸¹

從現有資料看，王遇與孫應時二人的關係並不密切。孫應時在〈與王郎中書〉中說「某自弱歲游學校，則已服膺先進重名，今踰兩紀，未遂承教之願，倦倦可言」。²⁸² 這封書信大約是慶元二年前後，應時在知常熟縣任上，距孫應時在乾道八年登太學，正好二十四年，即所謂「兩紀」。所述內容，顯示二人未直接來往，一直到慶元二年，才由吳斗南（仁傑）介紹與他認識，次年應時有詩「和答吳斗南中秋見懷，並約王子合見過」。²⁸³ 說明二人雖同為象山兄弟的早期門人，但往來互動不多。

王遇，字子合，一字子正，號東湖，福建龍溪人。紹興十二年（1142）其父王羽儀中進士，同年生遇。王遇早年在縣學有聲，弱冠入太學，成績優越，升上

²⁷⁸ 王柏，《魯齋集》卷一二，〈跋櫟庵潘公帖〉，頁6下。

²⁷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四，〈與潘文叔〉，頁57；卷一三，〈與潘文叔〉，頁173-174。

²⁸⁰ 黃宗義，《宋元學案》卷七七，〈提舉潘友文〉，頁2592。

²⁸¹ 李紱，《陸子學譜》（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子部第27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無怒軒刻本影印），卷一二，頁23下-24上。本文關於潘友文與朱陸關係受趙偉《陸九淵門人》啟發，見氏著，《陸九淵門人》，頁244-245。

²⁸² 孫應時，《燭湖集》卷八，頁18上。

²⁸³ 孫應時，《燭湖集》卷一八，頁13下-14上。

舍。乾道五年 (1169) 中舉時，²⁸⁴ 呂祖謙任太學博士，拔擢為學錄。²⁸⁵ 後調臨江教授，相繼遭家父母喪，至淳熙十三年，才任蘄州教授，前後居家十七年。蘄州任滿，改任閩帥詹體仁、鄭僑幕府，尤袤、李祥 (1128-1201) 交相推薦，丞相趙汝愚將擢用，而偽學之禍興，乃轉任福州長樂縣丞。在任上興修水利，邑人植碑立祠以報。因功增秩，轉奉義郎通判贛州。丞相陳自強與子合為太學同舍，欲薦之。及韓侂胄就誅，丞相錢象祖薦遇為太學博士，改除諸王宮教授。嘉定元年十二月，毘陵大旱，²⁸⁶ 遇知常州，救災有功，嘉定三年 (1210) 六月，改任浙東提舉常平使。²⁸⁷ 四年閏二月，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因病終於位，享年七十歲。黃榦稱其「學識之精，義利之明，超然於流俗之中，不以一毫私意欲累其心」，又說「公以少年擢高科，諸公薦引不容口，才非不足於用也，宜超躡貴顯矣，乃反抵回遜避，若不屑就。從仕四十餘年，列於朝者不過數月，官不過郎曹，用不足盡其才也，而鞠躬盡瘁，不擇險易，蓋至於老且死而無憾焉」。²⁸⁸ 王遇在蘄州與諸生講論兩漢興亡之大端，集而成編名曰《漢議》及其他文集藏於

²⁸⁴ 關於王遇中舉年代，黃榦所撰作乾道五年，與陸九齡同年。但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二，作乾道八年；陳道，《弘治八閩通志》卷五一，〈選舉〉作八年黃定榜則與象山同年；劉天授，《嘉靖龍溪縣志》卷七，〈選舉〉亦作八年；何喬遠，《閩書》卷一一七，〈英舊志〉亦作八年，均誤。而龔延明列為孫應時同年的王遇，生平仕歷無可考。若有此人亦非《燭湖集》所記之王遇。參見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三，〈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官王公行狀〉，頁 4 下；朱衡，《道南源委》（收入《百部叢書集成》26《正誼堂全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第 10 函，據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影印），卷二，頁 35 下；陳道修，黃仲昭修纂，《弘治八閩通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33-34 冊，據明弘治刻本縮印），卷五一，〈選舉〉，頁 7 上；劉天授修纂，《嘉靖龍溪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古籍書店，1982〕，第 32 冊，據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重印），卷七，〈選舉〉，頁 4 下；何喬遠，《閩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史部第 204 冊，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卷一一七，〈英舊志〉，頁 6 上；傅璇琮主編，龔延明、祖慧編纂，《宋登科記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989, 1035。

²⁸⁵ 見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答潘叔度〉說：「君舉、伯永亦已參學矣。王子合為學錄，甚舉職，以此知人略有志，隨分量變得力。」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續金華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第 9 冊，據宋刊本影印），卷一〇，〈答潘叔度〉，頁 17 下。

²⁸⁶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八，〈秩官二〉，頁 11 下。

²⁸⁷ 張昞，《寶慶會稽續志》卷二，〈提舉題名〉，頁 37 下。

²⁸⁸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三，〈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官王公行狀〉，頁 9 上-下。

家。其婿楊士訓，彰浦人，為朱熹在彰州之學生，王遇見而奇之，妻以女，號盤庵。慶元二年進士，死於鄂州糧料院任上，黃榦亦撰有墓誌。

王遇也是師從多位大儒的士人。黃榦在王遇行狀中，說他從中進士至閑居期間，「不遠千餘里，受業於晦庵、南軒、東萊三先生之門，考德問業，以正學不明為己憂，精思力行，以求自得，不務為人口出耳，釣名聲，求利祿，涵泳潛潛，所蘊益富，而人亦以大用於世者期公矣」。²⁸⁹ 除三位大儒外，王遇也是薛季宣與陸九淵的門人。

王遇與張栻關係，由於資料不足，難以瞭解。他與薛季宣的關係，只存於他在乾道九年八月祭薛季宣文，文中說「昔遇聞風既久，幸及今而登門兮……矧遇小子，受教未幾兮，豈謂一見而遽為終身之恨兮」，說明實際受教的時間甚短，但已是入門的弟子。²⁹⁰ 他與呂祖謙的關係，分別見於東萊致潘景憲、喬拱（德瞻，1145-1173）與汪應辰（1119-1176）的信中。大約乾道三年（1167），東萊在明招山講學，學生甚多；次年夏，他給喬拱書中說：「王子正自湖州來，秋涼乃歸，欲因整頓國朝治體，吾友數日間便撥置，為此來乃佳，蓋目下書院士人多歸，欲及此暇時講究，若至秋深入多，卻難得工夫也。」²⁹¹ 此時王遇尚為太學生，到武義遊學，殆為現存二人關係的最早資料，但從書信內容看來，東萊當在更早即認識王遇。到乾道六年（1170）秋，東萊致潘景憲信中，對時任太學學錄王遇的表現甚為讚賞。²⁹² 到九年，王遇尚在待闕中，欲晉見汪應辰，請祖謙協助，東萊特給汪應辰寫信：「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為人殊務實，願得親聲欵，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浸衰，真知尊敬前輩者，蓋不多得，儻示以端緒，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到尚在一、兩月後，更不詳稟」。²⁹³ 從這三封相關的信看來，王遇是得到呂祖謙賞識的一位門人，淳熙九年三月，東萊逝世後，王遇以學生的身分致祭，在文中對東萊推崇備至，說「載惟先生，二五之會，渾然天

²⁸⁹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三，〈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官王公行狀〉，頁5上。

²⁹⁰ 薛季宣，《浪語集》卷三五，〈祭文〉，頁8上。時王遇為迪功郎新臨江軍學教授。

²⁹¹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與喬德瞻〉，頁45上。此信繫年尚不清楚，謹依呂祖儉、呂喬年編，李文澤校點，《東萊呂太史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10冊），記乾道三年冬「在明招學子有來講習者」，則信應在次年夏、秋間。參呂祖謙，《東萊集·附錄》卷一，頁5下-6上；杜海軍，《呂祖謙年譜》，頁35-39。

²⁹²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答潘叔度〉，頁35上。繫年依杜海軍，《呂祖謙年譜》，頁85。

²⁹³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七，〈與汪端明聖錫〉，頁4下-5上。

成，不事矯揉，左規右繩，人所難克，如水東傾，人所忽易，如器執盈，德量海納，神宇淵停……末惟小子，師門夙登。方在荼毒，義激襟靈，為位而哭，豈其私情」。²⁹⁴

王遇與朱熹的關係甚為密切。現存朱熹的資料中，《朱子語類》有三條與王遇有關的論學記載，《朱子文集》中答王子合的書有十九條，此外，在答陳孔碩（膚仲）、李祖閔（守約）、陳安卿（仲山）、黃榦、劉炳（韜仲）等人的信中，都提到王遇，總數共二十五條。這些書信，依陳來的編年，相對集中於淳熙二年（五信）、十四年（五信）、十五年（五信）、十六年（四信）、紹熙二年（一信）、四年（二信）及慶元五年（一信），其內容則以論學為主。淳熙二年是朱陸鵝湖之會，朱熹在答王遇的第一封信即是在鵝湖後的六月，說「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²⁹⁵ 強調「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²⁹⁶ 並勸他解決思慮不一、胸次凝滯的毛病並不容易，不如「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²⁹⁷ 明顯是在批評陸九淵兄弟的心學。

淳熙十四年，王遇則請教禮書釋義問題。朱熹頗覺子合講論支離，認為「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答書只是「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可漸進之階耳」。²⁹⁸ 其後論太極、陰陽、致生死及大學等問題，²⁹⁹ 則是闡釋自己的觀點。淳熙十六年，子合至武夷問學並求學記。³⁰⁰ 朱熹在給陳孔碩（膚仲）信中討論永嘉學派對科舉的不良影響及批評林栗

²⁹⁴ 呂祖謙，《東萊集·附錄》卷三，頁28下。

²⁹⁵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王子合一〉，頁2209。

²⁹⁶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王子合五〉，頁2213。

²⁹⁷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王子合三〉，頁2211。

²⁹⁸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王子合八〉，頁2217。

²⁹⁹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王子合十一〉、〈答王子合十二〉，頁2221-2227。

³⁰⁰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五，〈答李守約十二〉，頁2626；繫年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302；《朱子文集·續集》卷四下，〈答劉韜仲〉，頁4984。

讀〈西銘說〉「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稱王子合寄來的大學講義「頗詳悉」。³⁰¹ 紹熙四年稱讚子合「議漢事甚熟」。³⁰² 及朱熹在濟州時，王遇致書朱熹，疑其行經界法擾民。朱熹有一信，針對經界及彰州人士阻經界之陋俗，有所回應說：「所論土封事，當時卻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³⁰³ 從這些書信的內容看，淳熙年間，朱熹藉批評象山學術，以導正王遇的觀點，因此書信內容較強調自己的觀點，二人的來往互動相當頻繁。

不過，慶元黨禁後，王遇與朱熹的關係轉而疏遠。慶元五年，朱熹答黃榦的書中，即透露出慶元黨禁對王遇造成的壓力，他說「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卻能如此，甚不易得」。³⁰⁴ 話說得委婉，但證諸《慶元黨禁》一書記慶元五年正月，因蔡璉誣告趙汝愚事，牽連彭龜年、曾三聘、葉適、項安世等人，引發王遇驚恐。此時，子合在福州長樂宰任上，因與陳自強為太學同學，獲薦為贛州通判，黃榦描述他此時期與陳自強的關係用詞隱晦，則王遇的心情與處境與朱熹的關係，當甚為微妙。³⁰⁵

王遇與朱熹門人廖德明（子晦）、黃榦（直卿）關係甚為密切。朱熹在淳熙二年答王遇所問中有二信提及德明，一說「子晦相見，煩致意，未及奉書」。³⁰⁶ 其二則針對德明與子合討論曾子受季孫賜簣是否合於禮的答覆。³⁰⁷ 紹熙二年，朱熹答陳淳（1159-1223）與廖德明、王遇關於「妻父鬼神」說，引廖德明、陳淳與

³⁰¹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陳膚仲〉，頁 2236-2237；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 896。

³⁰²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王子合十八〉，頁 2230；羅大經著，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甲編，卷六，〈經界〉，頁 111。

³⁰³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王子合十八〉，頁 2230。

³⁰⁴ 朱熹，《朱子文集·續集》卷一，〈答黃直卿〉，頁 4911。書中提及的普之，或為淳熙八年中進士的潘涓，待考。承童永昌先生提供資料。

³⁰⁵ 參見樵川樵叟，《慶元黨禁》，頁 26 上-下；佚名，《兩朝綱目備要》卷五，頁 20 下-22 下；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三，〈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官王公行狀〉，頁 6 上。

³⁰⁶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王子合二〉，頁 2210。

³⁰⁷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四九，〈答王子合四〉，頁 2211-2212。

黃寬重

王遇不同意見，同意陳淳引謝良佐之說為是。³⁰⁸ 陳淳在王遇任長樂宰及贛州通判時，分別有二首律詩相送：〈送王子正宰長樂二首〉及〈送王子正赴瀛倅〉。³⁰⁹ 詩中對王遇充滿期待，如送其宰長樂，稱：「一陽天運復來亨，君子隨時亦吉征，暫向三山瀕海處，小馳百里愛人聲，從知文物新長樂，便作絃歌舊武城，須信道行由此兆，牛刀指日宰寰瀛」；送赴瀛則稱：「飛騰仙馭自漳濱，去去西隅指瀛津，夾道賓僚方一際，滿城老稚便皆春，正心誠意平生學，愛物親民此日仁，只恐貳藩車未煖，紫泥催促貳皇鈞」。而黃榦與王遇關係最密，除了幫他寫行狀，更寫祭文，說王遇努力踐行道學理念，鞠躬盡瘁、澹泊名利、非義勿求，更指其為朱熹門人「如君之賢，固宜享期頤，躋貴顯，為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榦亦同門，多艱棘也，慙慙顧念，感君德也，哭君之亡，病弗克也，奔君之喪，阻行役也，緘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橫臆也」。³¹⁰ 因之，王遇當為朱熹門人。

王遇亦從學於陸象山，但相關資料僅見於包揚所錄的一條語錄，說「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惡性善，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³¹¹ 語錄不明時間，若參酌李紱所說「子合與文達公為同年進士，又屢仕於江西，故問學於陸子」。³¹² 陸九齡於紹興三十一年入太學，乾道五年中進士，³¹³ 與王遇當係熟識兼同年，此一因緣促使子合問學於象山，時間約在乾道年間，象山於乾道八年中進士。其後編方志者不察，誤以子合與象山同年，遂誤為乾道八年進士。相較於呂祖謙、薛季宣、朱熹等人，子合與象山的關係顯得疏遠。³¹⁴

³⁰⁸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五七，〈答陳安卿〉，頁2786。

³⁰⁹ 陳淳，《北溪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卷三，〈送王子正宰長樂二首〉，頁3上-下；卷三，〈送王子正赴瀛倅〉，頁7下。

³¹⁰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祭王子正〉，頁13下-14上。多謝童永昌先生提供本資料。

³¹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五，〈語錄下〉，頁470。

³¹² 李紱，《陸子學譜》，頁15下。

³¹³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二七，〈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頁313-314。

³¹⁴ 參趙偉，《陸九淵門人》，頁54-55。

四・結論：象山早期弟子學術轉向的觀察

以往學界在探討學術流派發展時，較側重領袖人物的言行、互動及其影響，少從學習者的角度，去理解他們師從乃至轉變的原因。這在研究南宋道學發展，尤為明顯。此一現象，當然與學習者資料不足有關，卻不利於對整體學術樣貌的掌握。為了彌補此一不足與偏失，本文的研究重點，放在各大儒在思想學說發展與競合期間，追隨者選擇學習典範，師從其學，及轉變的因素，乃至轉益學習典範後，對師徒關係與學派發展的影響。

南宋中期，學術與政治的糾葛甚深，變動頻繁，牽涉者眾，為時又長。但其中除少數人外，絕大多數參與或追隨者，由於資料相當零散，蒐集與整理甚為不易。為逐步突破限制，本文繼研究孫應時之後，選擇其早年從學象山的學友為對象，透過對每個人的師從及其變化加以討論，期能從另一個側面瞭解此一時期道學發展的面貌，進而結合既有研究成果，對南宋中期的學術與政治的發展，提供若干觀察心得。由於資料十分零散，每位學者的學習歷程，都是經由片段的資料拼湊而成的。這樣的成果，不論對個人或當時學界整體發展的觀察，都有其侷限，與學界長期以來，以大儒為對象所獲致的豐碩、堅實結果相比，談不上大創見。但由於探討的角度不同，及對個案資料的細緻梳理後，所提的若干意見，或許能對既有觀點提出修正或補充。而其主要用意，則在提醒學界過於偏重特定資料或角度，將複雜多樣的人事，導向簡單化、單一化的結論，有其危險性；在名臣大儒之外，強化一般士人、官僚資料的整理與探討，對理解學術與政治的整體發展，有其重要性。

從孫應時這一批陸學早期學友的學術成長及其學習變化的過程，我們可以對幾個南宋中期道學發展具有意義的詞彙，來加以梳理。首先，是對「門人」一詞界定的標準。從相關的資料可以看到三個不同的稱呼，一是師徒當事人的自我認定，一是當時學友的認知，及後世學者從學術脈絡或內涵的認識。

以本文所列象山早期門人而言，從文字的表述看，楊簡與袁燮二人，均自稱門人，師生關係最為明確。³¹⁵ 其他人沒有自承為門人的文字，但從袁燮的《陸九淵年譜》，及朱熹在淳熙十年致書象山說：「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

³¹⁵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三，〈行狀〉，頁394；卷三六，〈年譜〉，頁487, 516, 518；〈附錄一〉，頁535, 537。

得為多，甚幸。」³¹⁶十五年，朱熹也說：「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³¹⁷及葉適於慶元元年說：「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為其學尤眾」³¹⁸所作的概括性陳述。呂祖謙在淳熙五年給朱熹的信中說：「劉淳叟舊從二陸學」，³¹⁹朱熹於淳熙十三年答廣西安撫使詹儀之的信中說：「高教授（按指高應朝）……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為己」，³²⁰也明指高應朝是象山的學生。即便是與象山關係較為疏遠的潘友文與王遇，以李紱所見，在學術內涵上亦多陸學門徑。因此概括上述的認定，將這些人視為陸學門人當可接受。

這些士人與當代其他大儒的關係如何界定？從當事人或當時認定的師生關係而言，石斗文、石宗昭、高應朝、潘友文及王遇，均自稱為薛季宣的門人。劉堯夫在〈祭呂祖謙文〉中也自承「登公之門」。³²¹陳剛受呂祖謙肯定，呂並介紹給朱熹，以致朱熹認為陳剛是東萊的門人，批評陳剛時也說：「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劉堯夫則在《朱子語類》中被列為朱子門人。³²²項安世師從張栻甚久，不僅以懇詞祭南軒，呂祖謙也希望他「深思力踐」師學。³²³元人徐明善稱「平父（項安世）所事朱張呂陸，皆繼孔孟之傳者。」³²⁴《宋元學案》則將項安世同列入朱陸門人。陳亮稱潘友文「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³²⁵趙蕃說潘友文「嘗登其（指張栻、呂祖謙）門，如戶發管籥」；³²⁶王柏也說潘氏三兄弟皆在弟子之列，「公（友文）嘗登考亭之門」；³²⁷黃榦則說王遇「受業於晦庵、南軒、東萊三先生之門。」³²⁸這也是很明確的師生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從現有資料看

³¹⁶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頁494。

³¹⁷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六，頁503。

³¹⁸ 葉適，《葉適集》卷一七，頁338。

³¹⁹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八，頁12下。

³²⁰ 朱熹，《朱子文集·正集》卷二七，頁1306。

³²¹ 呂祖謙，《東萊集·附錄》卷二，頁12上。

³²²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〇，頁2912。

³²³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一〇，頁26下。

³²⁴ 徐明善，《芳谷集》卷三，頁40下。

³²⁵ 陳亮，《龍川集》卷一六，頁2上-下。

³²⁶ 趙蕃，《淳熙稿》卷一，頁28上。

³²⁷ 王柏，《魯齋集》卷一二，頁2上-下，6下。

³²⁸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三，頁55。

來，像石斗文、石宗昭、高宗商，從學於薛季宣、呂祖謙；項安世、王遇，從學於張栻、呂祖謙；潘友文從學於薛季宣、張栻與呂祖謙的時間，都明顯早於師從象山兄弟。至於從游、論學、問學的例子更多，包括石斗文、諸葛誠之、高宗商、袁燮、沈煥、舒璘、孫應時，均曾從呂祖謙游。沈煥、楊簡亦為薛季宣論學之友，陳剛從呂祖謙、陳亮、陳傅良、葉適等講功利之說，袁燮與陳傅良、石斗文與陳亮、石宗昭與葉適游，諸葛誠之亦受功利學說影響。至於師從或問學於朱熹的陸門弟子則更多，除上述劉堯夫、項安世、潘友文、王遇之外，包括高宗商、陳剛、石斗文、石宗昭、諸葛誠之、胡榘、孫應時、袁燮、楊簡、沈煥等人，但從游與從學的時間，則顯然晚於師從象山兄弟。

藉著本文對陸門弟子學習歷程與師從變化的整理，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看到南宋中期道學大儒：薛季宣、張栻、呂祖謙、朱熹乃至陳傅良等人的互動關係，同時也有助於釐清幾個概念性的問題。

其一是道學發展過程中，門戶的藩籬是逐步形成的。道學在南宋發展的初期，大儒之間的思想學說雖有分歧、對立的一面，更重要的卻是透過交流辯論，彼此學習、修正其觀點，形成兼容並蓄的競合現象。在此一自由學習的氛圍下，讓追尋道學理念的士人，有從容的機會，向不同觀點的大儒問學、請益，因此出現多方從學的有趣現象，從游、從學、問學、論學風氣甚盛，顯示士人具主動探詢知識的動力，門人師生之間的界限，相對模糊。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薛、張、呂逝世時，陸門弟子以學生的身分致祭。甚至連持守陸學的甬上四君子楊、袁、沈、舒，亦多與呂、朱等人往來論學。道學大儒尤樂於推薦後學給學友，如：呂祖謙向朱熹推薦劉堯夫、陳剛，向汪應辰推薦王遇，項安世也因曾逢的介紹，從學於張栻、呂祖謙與朱熹。時人甚至以同時受教於名儒為榮。陳亮盛讚潘友文從學於張栻、呂祖謙、朱熹三位「世所謂三君子者」，趙蕃讚潘友文的家學與師從是「斯文呂與張，用世故落落」，黃榦也說王遇居鄉期間，不遠千里授業於晦庵、南軒、東萊三先生之門。顯然在當時，士人兼從多師被視為正常。象山兄弟及其早期門人，對師生與從學的觀念顯得相當開放，正反映這一時期的學術氣象。

這種開放的論學風氣，不僅朱、陸等大儒，藉由論學修正或充實其論點，³²⁹連甬上四先生，也經由來往論學，調整其觀點，從而看到師從對象，並不成為鑒

³²⁹ 這一點陳來已有深論，見陳來，《朱熹哲學研究》，頁 271-355。

別學術流派的關鍵。同時由學生師從的過程，可以看到陸門弟子中，有不少人先前或同時是薛季宣、張栻、呂祖謙等人的學生，因折服於心學的新說，而成為道學新銳象山兄弟的學生。象山顯然是這一環境下的受惠者。

其二是，從陸門弟子的學習動向，可以發現他們有由兼學多師轉向轉益他師的移步或轉身現象，對陸學的發展是一大考驗。學界對陸學，多將焦點集中於朱陸之爭，且對此一趨向提出很多見解；有陸子晚年思想向朱熹傾斜，³³⁰ 陸的門人實不乏趕熱鬧者等多種說法。³³¹ 或以象山學說思慮細密，且善於演講，學者易受感動，但若無堅實學識，又欠哲思慧心，則難以追隨。本文第三節中常見象山對其門人的批評，如說石宗昭「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至今茅塞，每為悼嘆」，說高宗商「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礪，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為無傷也」，均顯示其門徒在哲思境界難契合於象山。³³² 這些說法各有其理由。但從本文的討論，對上述可以有所補充。

首先，陸門弟子轉益他師，也就是陸學的挑戰，有二個階段。第一個挑戰顯然來自以呂祖謙為主的功利學派。呂祖謙既承中原文獻之家學，且與薛季宣、陳傅良、陳亮、葉適等浙東功利學派的學友，往來密切，加以任職太學、館閣的身分，成為乾道、淳熙學術主盟者，具領袖地位。呂祖謙善於賞識提拔人才，不僅陳亮、葉適、陳傅良、朱熹等人，均曾受其拔擢，身為太學生的陸象山及其以太學生為主的弟子，尤直接受惠於東萊。東萊與功利派諸友主要活動地區在浙東，聲勢甚壯。陸門弟子活動地區亦多在浙東，而其釋褐入仕後，亦需藉由功利學派學習觀點與經驗，以利政事推動，因此仍從游於東萊，乃至其學侶者多。從游受學不免受其影響，從而有轉益師從的跡象，這從石宗昭祭呂祖謙文中，述及的學術趨向，就相當明顯。此一現象，象山在初期似不介意。但呂祖謙逝世後，功利之說在浙東的影響加深，引發象山不滿情緒，著力批判功利之學，說「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卻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

³³⁰ 黃彰健，〈象山思想臨終同於朱子——孫應時與朱子及陸象山往來書信繫年〉，《大陸雜誌》69.1 (1984)：32-42。陳來對朱陸學說異同、門人轉向的發展過程，有很精闢的見解，參見陳來，《朱熹哲學研究》一書的第四部分〈朱陸之辯〉，頁 271-355。

³³¹ 何俊，《南宋儒學建構》，頁 210。

³³²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四，〈語錄上〉，頁 412。此說承匿名審查人之一提醒，謹此致謝。

弈，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個大不慳慳去」，³³³ 掀起呂、陸兩派門人的相互抨擊。³³⁴ 同時，對先前石宗昭祭呂祖謙文中所述及的學術方向，深為不滿。將兩人往來書信封存，並題為「石應之公案」。不過，此時的情況尚不嚴重。等到朱陸關係緊張後，象山更向高宗商強烈表達對石應之師從轉向的不滿。

淳熙七、八年，張栻、呂祖謙二位受尊重的道學大儒相繼逝世後，朱熹奉詔到浙東賑災，與浙東的功利學派及象山心學有密切互動。此時陸學在浙東的發展正盛。從朱熹在淳熙的若干言論，與史浩退閒後，邀甬上四先生在四明推動陸學相結合，可以看到陸門的盛況。但此時，朱熹挾其學、政優勢，一方面與兩派論辯，一方面則拔擢人才。陸門的孫應時、石天民兄弟、諸葛誠之、陳剛、劉堯夫、高宗商、潘友文、王遇、沈煥、胡搏等人，分別與朱熹有頻繁的論學與政務的互動，從而產生學習轉向的現象。從淳熙十年至十三年間，經〈曹立之墓表〉一事的激化後，掀起朱陸之間的強烈對立，是陸學受到的第二波巨大挑戰。對此一形勢，除了受邀回到明州講學的楊、袁、沈、舒，在史浩的協助下，有較強的凝聚力，繼續闡揚師說，成為發揚陸學中心外，轉向者不少。遂使朱陸由個人學說異同，及於兩派之對立。象山對弟子向朱熹問學乃至師從，特別敏感，因此在紹熙元年給高宗商的信，及紹熙三年給孫應時的信中，針對石宗昭、高宗商與孫應時三人的師從轉向，都有很強烈的批評，其失望之情與用詞之苛，較之劉堯夫與陳剛的事佛出家尤重。可以說，門人的轉益與學派競合聯結，使初期兼容並包轉向對立、門戶森嚴，且愈演愈烈。

袁甫在嘉熙年間撰寫的〈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時，就對此一發展有所批評。他說「四先生（按指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于是藩牆立，畛域分，所謂切己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睽離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于漢儒，可悲也夫……弟子之尊其師，當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正，大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於一話言之間，一去取之際，屑屑焉較短量長，以是為能事哉。」³³⁵ 此一發展趨向，與北宋晚期道學發展軌跡，頗有類似之處。³³⁶

³³³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四，〈語錄上〉，頁412。

³³⁴ 陳來，《朱熹哲學研究》，頁310。

³³⁵ 袁甫，《蒙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5冊），卷一四，〈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頁16下。

³³⁶ 學界前輩對北宋道學分途發展論述眾多，可參見：土田健次郎著，朱剛譯，《道學之形

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陸門早期弟子兼學或轉益師從者，多具太學生身分。北宋以來，朝臣針對以科舉考試拔擢人才的得失，屢有檢討，在各次改革中，都認為透過教育的途徑，較之以文藝內容競一日長短，決定個人的仕途及錄用官員的科舉選人方式，更能兼顧才德、培養通才，有利於朝政之推動。為了扭轉科舉選人之弊，廣設學校，且建立一套循序而進、晉用人才的途徑；中央設置的太學，不僅成為國家教育的最高學府，也是教育與任官結合的重要階段。從王安石推動太學三舍起，經崇寧年間，徽宗與蔡京進一步擬經由學校升級選拔制度，完全取代科舉，此一變革雖未實現，但由太學上舍取得官位者大增。到南宋，太學制度有進一步的發展，太學生有直接任官的機會，及較多科舉解試的合格名額，因此太學在人才選拔上，不僅發揮了與科舉同樣重要的作用，更吸引大量志在功名的平民士人進入太學。高、孝兩朝太學生的總額雖不明確，估計在七百至一千人之間。³³⁷

以往學界對宋代太學的研究較重視組織制度及其變化，且偏重於士人爭取科舉功名。反之，對學術傳播功能未曾措意。其實在宋代，太學也是大儒傳揚學說的重要場所；特別是在道學發展的角色，值得學界進一步探討。士人進入太學，雖志在功名，但有一套循序漸進的教育檢核制度，以及由朝廷任命素質高的學者擔任太學博士等學職，教導學生。因此，太學在南宋雖是士人進入仕途的一個重要管道，但不像科舉考試，純由文藝競試較數日之長短，即能取得任官資格，而是與教育結合，學習時間較長，與博士、學錄、學正及同輩的交流頻繁是其特色，是一個多元且開放的人才養成所。師生容易在學習過程中，形成社群及追尋典範。

孝宗初期朝政相對清明，呂祖謙以中原文獻之傳及繼承伊洛之學，任太學博士，在太學宣揚道學理念、引領道學的發展，³³⁸ 眾多太學生同時感受到師友薰

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³³⁷ 李弘祺與袁征在這一方面都有研究。見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頁 59-115；袁征，《宋代教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頁 101-188, 315；林岩，〈南宋學校取士諸問題考論〉。

³³⁸ 參見王曉發，〈中國古代學術傳播途徑探析——以宋代理學傳播為中心的探討〉，《中華文明的歷史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頁 227-228。

陶，日夜相處，彼此砥礪，容易激發追求學術的熱忱。本文所舉的孫應時、甬上四君子、石應之、石天民、諸葛誠之、胡拱、高宗商、劉堯夫、王遇等人，都是太學生，甚至連陸九齡、陸九淵也曾是太學生與學職人員。他們利用太學結交同道，其情況正如沈煥對他的四明諸友所說的「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為長技，大可懼也」，以此引發同學學習的動機，「五、六年間朋從日盛，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為不朽計」。³³⁹ 楊簡在追悼沈煥文中，也指出他在太學「首見吾叔晦，闡正論，且辱告曰：『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游，相與切磨講肆，相救以言，相觀而善」。³⁴⁰ 沈煥揭示太學是「資明師畏友」的理想場所，除了同學相互切磋之益外，也在追求學習典範，並不考量年齡與身分。王遇、石斗文與陸九齡是同年；石應之、高宗商與舒璘為象山同年，但象山在道學的闡述上，另闢蹊徑，直指本心，又善於講說，學友莫不欽服，雖為同學、同年，乃拜之為師，藉以突顯他們求道的意願，與二程傳道的旨意略近。³⁴¹ 因此，太學這一個天下菁英匯集的場所，雖以現實功名為目標，但因有著開放的學習環境及象山兄弟的獨特魔力，讓不以追求功名利祿為已足的同儕們，傾心師從，成為其門人。此一師生關係殆為朱熹「道學」和永嘉學派之外的另一模式。³⁴²

但這個菁英聚集的最高教育學府，在宋代士人的心中，仍是進入仕途的重要階梯，誠如林駟所說「三歲大比，生於春官，由太學而進者居多。士之遊太學，蓋無一而非進身之階也」；³⁴³ 因此，太學同時也是官僚的養成所。官僚的晉升，需要長官的賞識與推薦。對太學生而言，太學是兼具學習知識與經營人脈的地

³³⁹ 袁燮，《絜齋集》卷一四，〈通判沈公行狀〉，頁19上。

³⁴⁰ 楊簡，《慈湖遺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6冊），卷四，〈祭沈叔晦文〉，頁9上。

³⁴¹ 陳雯怡，〈「承道」論述與「求道」傳記：宋代「師友淵源」概念的發展與表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12年6月20-22日），頁13-14。

³⁴² 此論點為魏希德之觀點，見 Hilde 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42-46; 陳雯怡，〈「承道」論述與「求道」傳記〉，頁38-39。

³⁴³ 林駟，《古今源流至論·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2冊），卷一〇，〈州縣學〉，頁12下。本資料轉引自林岩，〈南宋學校取士諸問題考論〉一文。

方，也是高官鴻儒識才、拔才的所在，這種兼具理想與現實、學術與仕途的環境，讓太學成為知識匯流、訊息開闊、學習管道多元，乃至建立人脈的知識殿堂。在這裡往來名儒多而頻繁，思想見解各有擅長，因此，透過從師學習，尋求典範，獲取功名乃至追求生命價值，是不少太學生同時想達成的目標。在此一目標下，同時或因環境而師從多位名師，甚至轉益他師，是太學生多元學習的主動性與主體性的選擇。乾道八年，陸象山在中進士返回江西的行程中，有眾多跟隨受教的太學同儕，即是一例。兩年之後，呂祖謙到會稽尋幽訪古之旅，陪伴同遊者，也是這些太學生。其後又由陸九淵介紹給呂祖謙與朱熹，及呂祖謙介紹給朱熹請益受學的情況，相當頻繁多見，說明這些太學生的學習環境、性質與態度，與受教於單一老師的情況是有差別的，其師從的變異性也大。

除太學的性質易於從學多師外，他們的中舉入仕也影響陸學的發展。太學生釋褐之後，或到他鄉任官，或居鄉待闕，各自尋求前途與事業發展機會，枝披葉散，太學時期共學砥礪條件不再，凝聚向學之力相對消弱。象山雖然在學術思想上異軍突起，但在中舉之後，仍長期在家教書待闕，³⁴⁴ 難與呂祖謙、朱熹擁有與學術思想相結合的政治資源，相抗衡。況且其兄九齡在思想上亦有轉向朱、呂的跡象，³⁴⁵ 因此，除楊簡、沈煥、袁燮等在史浩延攬下，回到四明講學，凝聚力較強，維持陸學的基調外，³⁴⁶ 其餘的門人弟子，不論在現實上或學術思想上，師從轉向者不乏其人。³⁴⁷ 但隨著時勢的轉變，學生們的現實選擇，卻激起象山的的不滿，他在拉高了與功利學派，特別是朱學的對立與論戰的同時，更強化門戶的藩籬，進一步指責、批判石宗昭、孫應時、高應朝等悖離師門的弟子。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象山逝世，仍未停止。可以說從陸門早期弟子中，比例偏高的太學生的屬性來看，有助於瞭解陸門弟子轉益多師、不守一說的原因，以及南宋中期，諸派競合的發展過程。

這些以追求仕進為主的士人，在學習期間所形成的學術社群，一方面具有理想色彩，同時也有現實的考量，因此在多元學習及現實環境中，有向優勢靠攏的趨向。這一游離性格，面對政治打壓時，也容易顯現出來。陸九淵逝世後，朱熹成為唯一的道學領袖，其後因捲入朝廷紛爭，衍發出慶元黨禁的政治禁錮。韓侂

³⁴⁴ 袁征，《宋代教育》，頁 289。

³⁴⁵ 陳來，《朱熹哲學研究》，頁 291-304。

³⁴⁶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三民書局，2006），頁 83-85。

³⁴⁷ 參見陳來，《朱熹哲學研究》，頁 271-355；束景南，《朱子大傳》，頁 463-606。

胄出於現實考慮，雖未以激烈的手段對付黨人，道學未見解體，³⁴⁸但在肅殺、禁錮氣氛濃烈的現實環境下，許多道學的追隨者仕途受阻。³⁴⁹此一政治現實，對部分道學中人，不免形成壓力，唯恐影響前途，遂有出現迴避師門或向權勢屈服的現象，石應之、項安世、楊方、吳獵、王遇等人，都有類似舉動，而遭致朱熹或同道的譏評。黃榦後來也揭露了黨禁期間，部分同道在現實政治壓力下的表現，如在曾興宗的〈行狀〉中提到「偽學之禁興，一時學者諱名其師」，而深表不滿，轉而表彰曾興宗對朱熹執禮之勤與弔哀守喪之情與志學之專。³⁵⁰又在〈董縣尉墓誌銘〉中說：「偽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痛飲，挑達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嘗親厚，恨不薦己，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為遠害計。諸生雖從學，亦有為之搖動，欲托辭以告歸者」，³⁵¹興起「先師沒十有六年，交游凋落，後生無所師承，而為言將絕」之歎。其後，嘉定十六年（1223），曹彥約在〈跋東陽郭氏石洞書院記〉中，更以生動的例子，陳述士人面對黨禁的不同態度。他指出石洞書院記原本是葉水心之所作，樓攻媿之所書，朱晦翁之所題，在當時被視為「三絕」，但到了慶元四年以後情況丕變，「黨論方熾，士大夫恐掛名三公間，若將免己。（郭）希呂獨於此時，不以冷暖隨世道，取三公於擯棄中，而曰：『吾欲為門戶重』」。 ³⁵²從黃榦與曹彥約所舉的事例可知，在傳統社會，人們面對外在環境的轉變，有不同的因應態度、選擇不同的對應方案，並非一成不變。學術典範的選擇與政治現實的抉擇的考量因素，因人而異，多元而複雜，不能簡單看待。

（本文於民國一〇二年五月三十日收稿；同年十月二十四日通過刊登）

³⁴⁸ 何俊，《南宋儒學建構》，頁256-289。引田浩之說。

³⁴⁹ 這類的例子很多，孫應時之外，曹彥約在嘉定元年〈奏舉柴中行、李燾、吳柔勝狀〉中指出，三人都捲入黨禁中而「蹭蹬選調」或「亦遭論列」，是學禁的受害者。見氏著，《昌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7冊），卷八，頁16上-17下。本資料由童永昌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³⁵⁰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七，〈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君行狀〉，頁13下-14上。

³⁵¹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五，〈董縣尉墓誌銘〉，頁16下。本資料承鄭丞良博士提供。

³⁵² 曹彥約，《昌谷集》卷一七，〈跋東陽郭氏石洞書院記〉，頁14上-下。

黃寬重

後記

承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使本文從標題到內容均有修訂，謹此致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方大琮，《鐵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1178冊。
- 王柏，《魯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6冊。
-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1冊。
- 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3冊，據宋咸淳四年（1268）修，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趙懷玉刻，李兆洛校影印。
- 全祖望，《鮚埼亭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292-295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姚江借樹山房刊本重印。
- 朱國禎，《涌幢小品》，上海：中華書局，1959。
- 朱熹著，陳俊民校刊，《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 朱衡，《道南源委》，收入《百部叢書集成》26《正誼堂全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第10函，據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影印。
- 何喬遠，《閩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史部第204冊，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佚名，《兩朝綱目備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9冊。
- 佚名，《南宋館閣續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5冊。
- 吳澄著，吳當編，《吳文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
- 呂祖儉、呂喬年編，李文澤校點，《東萊呂太史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第10冊。
-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續金華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第9冊，據宋刊本影印。
- 呂祖謙著，呂祖儉、呂喬年編，《東萊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0冊。
- 宋濂著，蔣超編，《文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3-1224冊。
-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收入《宋史資料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第一輯。
-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5-327冊。
- 李紱，《陸子學譜》，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子部第27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無怒軒刻本影印。

黃寬重

沈作賓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7 冊，據宋嘉泰元年 (1201) 修，清嘉慶十三年 (1808) 刻本影印。

周必大著，周綸編，《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2-1103 冊。

周密著，張茂鵬點校，《齊東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林駟，《古今源流至論·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42 冊。

姜夔，《白石道人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5 冊。

柳貫，《待制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0 冊。

洪邁著，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006。

胡宗楙編，李春梅校點，《張宣公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 10 冊。

孫應時，《燭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6 冊。

孫鏗鳴編，吳洪澤校點，《陳文節公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 10 冊。

徐明善，《芳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2 冊。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民國二十五年前北平圖書館影印本複製重印。

真德秀，《西山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4 冊。

袁甫，《蒙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5 冊。

袁燾，《絜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5 冊。

袁燾、傅子雲初稿，李子願編，《象山陸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9，第 31 冊，據明嘉靖三十八年刻本影印。

張吳纂修，《寶慶會稽續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7 冊，據宋寶慶元年 (1225) 修，清嘉慶十三年 (1808) 刻本影印。

張栻，《南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

張壽鏞編，吳洪澤校點，《定川言行彙考》，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 10 冊。

張端義，《貴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5 冊。

張鑑，《南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4 冊。

曹彥約，《昌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陳亮，《龍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1 冊。

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陳淳，《北溪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

- 陳道修，黃仲昭修纂，《弘治八閩通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33-34冊，據明弘治刻本縮印。
- 陸九淵，《陸九淵集》，臺北：里仁書局點校本，1981。
- 陸游，《渭南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00-201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江南圖書館藏明華氏活字本重印。
- 喻良能，《香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1冊。
- 項公澤修，凌萬頃、邊實纂，《淳祐玉峯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據宋淳祐十一年(1251)修，清宣統元年(1909)《匯刻太倉舊志五種》本影印。
- 項安世，《平庵悔稿》，收入《宛委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第103冊。
- 項安世，《平庵悔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319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 馮可鏞、葉意深編，李春梅校點，《慈湖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10冊。
-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39-240冊，據上海涵芬樓借景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重印。
-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0冊，據元刻延祐二年(1315)重修本影印。
- 黃震，《黃氏日抄》，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據日本立命館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二年新安汪佩鏜重校刊影印。
- 楊萬里，《誠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195-199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景宋寫本重印。
- 楊簡，《慈湖遺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6冊。
- 葉適，《葉適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 趙蕃，《淳熙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5冊。
- 趙蕃，《章泉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5冊。
- 劉天授修纂，《嘉靖龍溪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古籍書店，1982，第32冊，據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重印。
-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11-216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舊鈔本重印。
- 劉宰，《京口耆舊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1冊。

黃寬重

劉宰，《漫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0 冊。

樓鑰著，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蔡幼學，《育德堂外制》，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 54 冊，據敬鄉樓叢書本排印。

蔡戡，《定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7 冊。

鄭元肅錄，陳義和編，吳洪澤校點，《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 11 冊。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樵川樵叟，《慶元黨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1 冊。

戴表元，《剡源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4 冊。

薛季宣著，薛旦編，《浪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9 冊。

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04-207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重印。

羅大經著，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

二·近人論著

于北山

2006 《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方如金

1996 《陳亮與南宋浙東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曉發

2010 〈中國古代學術傳播途徑探析——以宋代理學傳播為中心的探討〉，《中華文明的歷史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頁 220-239。

田浩

2009 《朱熹的思維世界（增定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李弘祺

1994 《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何俊

2004 《南宋儒學建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余英時

2003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杜海軍

2007 《呂祖謙年譜》，北京：中華書局。

- 束景南
1992 《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林岩
待刊 〈南宋學校取士諸問題考論〉。
- 周學武編
2003 《葉水心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第11冊。
- 胡坤
待刊 《制度運行與文書流轉：宋代薦舉改官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稿。
- 袁征
1991 《宋代教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徐紀芳
1990 《陸象山弟子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 孫齊魯
2010 〈陸象山與楊慈湖師弟關係辯證〉，《現代哲學》2010.2：116-122。
- 陳來
1988 《朱熹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1 《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
- 陳雯怡
2012 〈「承道」論述與「求道」傳記：宋代「師友淵源」概念的發展與表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12年6月20-22日。
- 陳榮捷
2007 《朱子門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梁庚堯
1997 〈南宋的社會〉，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下冊，頁424-473。
- 陶晉生
2001 《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曾維剛
2010 《張鑑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

黃寬重

黃彰健

- 1984 〈象山思想臨終同於朱子——孫應時與朱子及陸象山往來書信繫年〉，《大陸雜誌》69.1：32-42。

黃寬重

- 2006 《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三民書局。
2012 〈學宦皆空：孫應時坎坷困窘的生命側寫〉，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12年6月20-22日，頁1-30；後修改為〈學宦難兼：孫應時曲折多艱的生命歷程〉，柳立言主編，《近世中國之變與不變》，收入《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1-52。

傅璇琮主編，龔延明、祖慧編纂

- 2005 《宋登科記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楊世文編

- 2003 《薛季宣年譜》，收入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第10冊。

董金裕

- 1990 〈楊簡的心學及其評價〉，《國立政治大學學報》61：31-43。

趙偉

- 2009 《陸九淵門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錢穆

- 1989 《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

鍾彩鈞

- 2000 〈楊慈湖心學概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7：289-338。

關長龍

- 2001 《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

土田健次郎著，朱剛譯

- 2010 《道學之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Weerd, Hilde De (魏希德)

- 2007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Men of Many Masters:
On the Followers of the Lu School in Sun Yingshi's *Zhuhu ji*
Kuan-chung Huang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studying with various teacher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Neo-Confucian movement. Specifically, it focuse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using the example of Sun Yingshi's (1154-1206) sixteen "friends" who studied with Lu Jiuyuan (1139-1192), as recorded in Sun's collected works *Zhuhu ji*.

The interaction of Lu's students with other Neo-Confucian masters illustrates a few points about the Southern Song Neo-Confucian movement. First, the deep divide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formed over time. It had originally been common and even deemed meritorious to study with various scholars. Many of Lu Jiuyuan's students had studied with other scholars before they came to him. Second, however, it became a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Lu school when many of Lu's students tended to go beyond just learning from various teachers to "converting" to other schools. The Lu school was successively challenged by Lü Zuqian's (1137-1181) utilitarian school and Zhu Xi's (1130-1200) school. Except those few scholars in Siming who held fast to Lu's teaching, many of his students, including Sun Yingshi himself, had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Zhu Xi in both the political and scholarly fields and eventually turned to Zhu's teaching. As a result of this kind of "conversion," combined with the competition among schools, the separation among schools became more and more strict.

The fact that many of Lu's early students had attended the Imperial College provides us a clue to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The Imperial College was a diverse and open place for learning whe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uld easily form groups and pursue different paradigms. In addition, students there often tried to pursue official careers and scholarly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Since there were ample opportunities to meet and learn from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following several masters became a common phenomenon. This helps us understand how some of Lu's students, due to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 turned to Lü or Zhu who offered some

黃寬重

advantages in the political or scholarly fields. The case of Lu's early students following various masters show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plans of scholars for confronting changes in their environment. Thus, because individuals' choices of scholarly paradigms and decisions within their political realities varied, these cannot be simplified.

Keywords: Sun Yingshi, Lu Jiuyuan, Lü Zuqian, Zhu Xi, Imperial College